



# 新階級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廿七日

## 第一卷 第二期

### 本期目錄

民生經濟的發展形態.....	呂調陽
論戰時國營實業政策的實施.....	粟奇滄
論中國戰時金融統制.....	張葆恒
造成復興氣象的哲學基礎.....	會松友
行政與技術.....	杜定友
現階段的中國政治.....	何汝津
黨的文藝政策.....	劉鎮濤
小黃馬的哀歌(長詩).....	盧森

出版日五

南京圖書館藏

國民華中

# 民生經濟的發展形態

呂調陽

民生之與民生主義係同出一源，但前者確有指導的原理的作用。如果從具體方面着眼，用以解決某種時代某種環境中的民生問題為任務，其所得結論就是民生主義，如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等便是實現民生主義的基本方法；如果從抽象方面着眼，用以解決一切時代一切環境中的民生問題為任務，其所得結論便為民生哲學，如民生為歷史活動的中心和民生為社會進化的動力等便是一種歸納的指導原理。因此，要理解民生主義，便先要理解民生。

民生一詞，在我國本來流傳很久，範圍很廣，未見得有何意義，但在科學大昌的今日，拿來用在經濟上，便覺得意義無窮。因此，總理便採用它，其使用在經濟上。如總理一則說：「民生二字，為數千年已有之名詞，至用之於政治經濟上，則自本總理始，非獨中國向無所聞，即在外國亦屬罕見」（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又說：「今日科學大明，在科學範圍之內拿這個名詞來用於社會經濟上，就覺得是意義無窮了」（民生主義第一講）。

民生是什麼？總理會「拿個名詞來下定義，可以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同上）。一般研究民生問題的人，都根據它，但大多除微引外，很少加以發揮。就令人民、國民、羣衆，是站在政治學的立場而言，社會是就社會學的立場而言，並無分別可言。而生活、生存、生計、生命則究為相同的概念，抑為不同的概念？這個問題關係很重要，如果不把它研究清楚，則具體的民生主義還是無法理解。因此，便有從抽象的原理上來理解民生必要。

梁寒操先生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民生新義」底解釋），這是我所同意的。但是要明瞭它的全部意義，還須進一步來研究。否則國父所謂生活、生存、生計、生命等語，便不免是廢話了。反之，我們將此四語合而言之，即用生計維持生命，便是生活，因而便能生存。在事實的，是一點不錯的。因為在宇宙間，凡是生物，都是有生命的，因而都是要求生活的。生命的基本特徵，是同化作用，要有同化，便須消化。而消化則非消費不可，消費就是生活。這是一般生物所共同的生活現象。不過「人之生活，以溫飽為最先」（心理建設）；若「據近世文明言，生活之物質條件，共有五種，即衣食住行及印刷是」（物質建設）。但是人類是否可以如意的滿足這種物質的生活要求？否。因為「人之生活，莫不為生計所限制。是故生計完備，始可以在，生計繼絕，終歸於淘汰」（社會主義之派別與方法）。因之，人類要有「溫飽」的生活，必須要有「完備」的「生計」組織。而生計之英文ECONOMY一詞，可譯為經濟。換言之，就是人類要達到消費的目的，必須有完備的經濟組織。

考消費在經濟學上的地位，自始雖未被社會所重視，然在十九世紀初，經歐美衆多經濟學者研究後，消費論便占了經濟學的首要地位（參看拙著「民生主義經濟學」第三編）。國父亦說：「消費是甚麼問題呢？就是解決衆人的生存的問題，也就是民生問題」（民生主義第

一講)。總而言之，從生物來看，凡生命必起同化作用。要有同化便須消化。而消化則必須消費。消費就是生活。再從人類來看，一切生活要以消費為最先。無無論人或動物都是不能免的。而生計便是滿足消費的工具。不過動物只能順應自然，以維持其原始的自然的生活；人類則能利用自然，改變自然，以發展其生存，充實其生活。因而便富有經濟的意義。

消費的意義，在生理上，便是消費慾望，因為「構成人類」的「生元」，是有「知覺靈敏」，「動作思維」和「主意計劃」的，因而便構成了人類主觀的消費慾望；再在客觀上，便是消費需要。因為「人之生活，以溫飽為先，生元亦然。故其需要，以燃料為最急，而材料次之」(均見心理建設)。合此主觀與客觀便形成了人類的消費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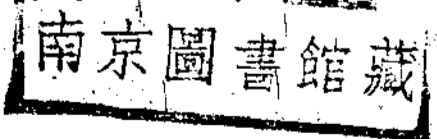
人類因為要滿足此種消費慾望，第一便須要在自然中尋找消費的物品，即認識自然，利用自然，以最初所獲得的結果作工具，從事生產。因而便構成了人類的生產行為。所以國父說：「三民主義」的第一步是解決生產問題。反之，如果不是為了消費，則生產便無從發生。國父曾舉漢冶萍公司的情形來考察，認定「實業的中心，要靠消費的社會。所以近來世界上的大工業，都是按照消費者的需要，來製造物品」(均見民生主義)。可知生產是以消費為目的，是為消費而行的。

生產充足以後，人類的消費問題是否可以得到如意的解決？否。尤其是在私有制度發生以後，因為在私有制度發生以前，人類只受着自然的限制；在私有制度發生以後，人類又受着社會的制限。即除向自然尋求解決辦法以外，還須向社會來找尋，即講求分配，改善分配，使在自然中所尋求的東西能夠轉到各個入底手里，實行消費。就是要「生計充裕，享受平均」(社會主義之派別與方法)。如果有了生產品而分配不好，使人無法享受它，是雖向自然尋求了辦法，亦不能算是民生問題的圓滿解決。所以國父主張「救其弊，祇有將一切大公司組織歸併通國人民公有之一法」(實業計劃)。也只有「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一全代會宣言)。因而分配便有了很大的重要性。因此，「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問題，也是分配問題，也是要同時注重」(民生主義)。

同時，交換對於人類生活也有莫大的關係。試看國父在少年時，即主張「貨物其流」(上學鴻章書)，二十六年後，又說：「夫國之貧富，不在錢之多少，而在貨之多少，並貨之流通耳」(心理建設)；而「實業計劃」，就是「國父所悉心籌劃的一部完善的交通計劃。實業，各地因自然關係，生產各有不同，如果不有交換與流通，則甲地之所餘，無以濟乙地之窮，人類生活不易得到滿足。此「古人野番無交易之機關，所以勞多而獲少，而文化不能進步者也」(同上)。

總之，人類因為要求生存，便須有消費的生活；因為要消費，便須要生產；各地的生產物，又因流通而增加其效用；更須使此種生產與流通的物品，能够平均分配到各個入底手里，實行消費，然後消費的目的才能如意達到，而民生問題也便完全解決了。因此，我們可以明白：人類為要維持「生命」的「生存」，便須要有完備的「生計」來充實其「生活」。而生計即經濟之意。所以國父認定「經濟問題之生產與分配，悉當以解決民生問題為目的」(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而「經濟學之概說，千端萬緒，分類周詳，要不外乎生產分配二事」(社會主義之派別與方法)。所以「民生二字，實已包括一切經濟意義」。

因此，國父把民生一詞，用在經濟上，無論是政治經濟或社會經濟也好，實有其偉大精深的意義。如果從現象上看，便是人類求生存的問題。國父一面說：「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一面說：「人類求生存，……才是歷史的重心」(民生主義)。這種人類求生存，是自古以來都是一樣的。不過在求生存的過程中，有時是用和平方式進行，有時採用戰爭方式。因為要用戰爭以維持生存，所以國父在政治生活中，便強調了戰爭的重要。如在「民權主義」第一講中說：「人類要能够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情：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就是自衛，……養就是食。自衛和食是人類維持的生存兩件大事」。誠然在政治戰爭中，是保重於養，而其根本目的，還是在維持



人類的生存。只以自古以來，人類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因而求生存的方法各有不同，而其根本原則則無二。

再從具體上說。歐美因機器發明，實業革命，於是機器便代替了人類的勞力，發生超過人類勞力千百倍的生產力，致工人多失業而無法生存，反過來擁有機器的資本家則是坐享厚利，使財富完全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形成極相懸殊的貧富兩大階級，而有嚴重的社會問題發生。

「個社會問題，就是……民生主義」。因為「民生問題，今日成了世界各國的潮流」，所以「總理」就是用民生這兩個字，來解決外國近百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問題，「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歐美社會黨，將來為勞所建，或者都要採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也是未可定的（均見民生主義）。這里可見歐美近百年來所發生的最大的社會問題。這是一個民生問題。在這個民生問題中，固然較我國為進一步，即是因機器發明，生產增加，食衣住行等物品的供給已相當充足，但一方面以生產工具是為私人所有，大多數人得不到勞動的機會；一方面財產制度又屬私有，大多數勞動者沒有購買的能力。致一面生產過剩，造成崩期的經濟恐慌；一面飢寒交迫，形成無已的社會運動。可見歐美各國的民生問題，就是一個分配問題。為要解決這個分配問題，所以「和平方法」和「激烈方法」，在歐美各國尚在交互的試驗過程中。這是具體的民生問題在歐美各國發展的一種形態。

反觀我國，經濟發展的形態雖不及歐美，而民生問題亦不及歐美嚴重，目前所有的事實，只是大家都是貧，這不是這樣，也只有大貧與小貧的區別。只以工商業尚未發達，食衣住行等物品無法生產充足，使大多數人都是無衣無食，有力無處用，形成整個的落後狀態。故目前的民生問題，與其重在分平均，如中國共產黨之所為，不如開發富源，以謀生產之充足。因此「總理」在民生主義中，即主張首先發達國家資本，保護私人資本，使「實業分兩路進行」，以謀生產之充足；但恐私人資本有操縱國民民生計之虞，故在發展之初，即實行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以免在進行過程中，私人資本有傾倒國家資本的危險。反之，在發展過程中，使私人資本得受有限制，國家資本可無限發展，致後者壓倒前者，有如大魚吃小魚一般，以達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社會。是有發展生產之功，而無分配不均之苦，即為分配平均於發展生產之中。使二者進行不背，真是和平轉變，有一勞永逸的功用。

因此，民生經濟之在我國目前，在生產方面。是國營實業，機器生產和保護私人資本；在分配方面，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和共同享受三者。而此種併行的發展，決非如目前歐美各國目前發展的經濟政策所可做到，反之，正需要遠大的目標，須密的計劃，才可以做得到。因此，「實業計劃」一書，便是「總理」實現民生主義的偉大計劃；而「廢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正是我國實業計劃的根本原則。如能本此原則直道而行，則在發展實業過程中，即寓有平均分配的意義。換言之，就是「兩次革命，同時并舉」，無歐美戰爭流血之慘劇，而有完成社會革命的功用。這就是民生經濟在中國發展的具體形態。

總之，民生問題就是食衣住行問題；而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就是生產與分配。歐美各國因為生產已經發達，分配問題尚未解決，便依然有嚴重的民生問題發生，故必須有第二次革命即社會革命來完成它；我國不僅分配不均，而生產亦不發達，故必須兩種革命同時並舉，即以一次革命的方法來完成它。這是在中外經濟發展的情形不同，因而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亦不同，然其為根本的民生問題則一。是在表面上，歐洲的社會主義與我國民生主義有不同，是一個經濟先進國與後進國的區別；而其根本問題還是在於民生。

因此，從具體說來。歐美自從機器發明之後，便有許多人一失失業，沒有工做。沒有做。這種大變動，外國叫做實業革命。因為有了這種實業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因為要解決這種痛苦，所以近幾十年來，便發生社會問題。所以社會問題之發生，原來是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也就是「人類求生存的問題」。我國目前尚未經過實業革命，雖然沒有像歐美一樣的社會問題發生，但在此五洲大通的決世界中，歐美經濟發展之影響及於我國，將來社會革命也是不能免掉的。如其至將來而再來一次革命，何如此時早來一個防微杜漸，而收一勞永逸的功用。因之民生主義之在中國，又有預防的作用。是在我國與歐美所用的方法雖不同，而其為謀人類生存則一。因此，從抽象方面看，「民生問題」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而「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這就是民生經濟在現代發展的兩種形態。

三十一年四月廿六日於江西贛縣陽明院

# 論戰時國營實業政策的實施

· 粟寄滄 ·

中國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於造成一自由平等的現代化的國家，而現代化國家的完成，則必須以現代化的經濟為基礎。但這裡所謂現代化的經濟，決不是指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否則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結果，必將重蹈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覆轍，陷於貧富懸殊勞資對立與社會革命的淵源，無異與國民革命的本來目的背道而馳。現代中國經濟的發展，必須竭力爭取非資本主義的前途，這是任何一個稍有正義感和遠見的人所贊同的。因此，目前中國一方面必須「迎頭趕上」歐美，採用最新式的生產技術，以推進工業革命過程，提高物質的生產力；而同時又必須採取「防患未然」的經濟政策，力避資本主義生產在歐戰社會所適成的種種惡果，這是現代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質，也是現代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任務。我們要想完成這一特殊任務，則必須奉行「國父中山先生的遺教：『中國今尚用手工為生產，未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歐美已臨其第二步革命者有殊，故於中國，兩種革命必須同時並舉，既廢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見實業計劃）。又說：『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見民生主義第二講）。『廢手工採機器』

，所以提高物質的生產力；『統一而國有之』則所以創造合理的進步的生產關係。『統一而國有之』的具體辦法就是國營實業。『此類國家經營之事業……以其財產屬之有國，而為全國人民利益計

，以經理之』（見實業計劃），假如全國的主要實業都採國營的方式，而當時的國家又是真正能實行民權主義的，則經濟生產發展所得的利益，當然歸全國人民所共享，而非為少數資本家所佔有。因之，私人大資本的壟斷與貧富懸殊的現象自然不會發生，而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的慘禍亦得以消弭於無形，此之謂「防患未然」。「一勞永逸」（中山先生語）的經濟政策。

以上還只是就理論上而言，在事實上，也只有國營實業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捷徑。為什麼呢？因為一個生產落後而又遭受國際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殖民地國家，要想使經濟生產很快地發達起來，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須有大量的資本；（二）須能避免生產的浪費；（三）須能抵抗一切外來的侵略勢力。只有國營實業才具有如上所述的三個條件：第一，它可以藉課稅或舉債的方法，以籌集雄厚的資本；第二，它可以實行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生產，以避免生產上的種種浪費；第三，它具有遠較私人經營為優越的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足以抵抗一切外來的侵略。因此，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只有採取國營實業政策，總容易動員及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與財力，以抵禦國際帝國主義的競爭與侵略，而迅速發展其本國的產業經濟。

## 一

「國營實業」是「國父中山先生在經濟上的重要主張，也是中國經濟建設過程中所應該採取的基本政策，我們在平時固須遵照執行，當此抗戰時期尤有認真實施必要，因為：

第一、近代戰爭所消耗的物資極多，因之，在戰爭的過程中，如果我們不能同時發展生產，增加物資的供應，則必難以支持長期的作戰。尤其是像我們中國，平日的生產既屬落後，而戰時的國際交通又容易受敵人的封鎖，所以更非積極發展經濟生產以謀自力更生不可。可是，有許多生產事業——尤其是關係國防的軍需工業和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鋼鐵工業，（鋼鐵工業，動力工業，機器製造業，基本化學工業等），或因所需資本太多，規模太大，非私人資本所能經營；或因設備無甚把握，私人不願經營；或因私人經營，易於流弊。凡此種種生產事業，皆非由國家自行經營不可，否則無以奠定長期抗戰的經濟基礎，這是戰時中國不能不加緊推行國營實業政策的根本原因。

第二、近代的戰爭是一種很浪費的戰爭，交戰雙方每日所耗費的金錢，動輒以千百萬計。近世各國籌措戰費的方法，大約不外下列幾種：①徵稅；②募集捐款；③動用儲蓄基金；④變賣公產；⑤緊縮普通設計；⑥增稅；⑦舉債；⑧發鈔。上列前五種方法，或因收入不確，為數有限，無濟於事；或因流弊太多，為民過甚，要非戰時籌款的良好。至於後列三者——即增稅，舉債與發鈔，則為近代各國籌措戰費的主要方法。中國自抗戰以來，對於戰費的籌措，大體以公債為主，以發鈔及增稅為輔。而公債的發行大半由銀行承受，因之，公債發行愈多，銀行的信用亦愈趨擴張。此種財政政策的結果，自然容易造成通貨的膨脹以及伴此而來的幣值低落與物價高漲等惡果。然最近政府的政策已顯有所變動：通貨已設法收縮；新發公債的發行則重攤派的方式；過分利得稅遺產稅及田賦征實正在加緊推行，而地價稅及土地增產稅亦在積極籌劃中。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最近中央注重專賣事業的收入，地方注意公共造產的收入，專賣事業與公共造產同屬國營事業的範圍，如果經營得法，收入必多，因而可能替我國的戰時財政開一新出路。這是我們戰時不能不認真推行國營實業政策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戰時經濟組織必須嚴密，力量務求集中，各種生產因素與各經濟部門必須配合適宜，然後物資的供應始能迅速有效。而

欲達此目的，則非實行嚴格的統制經濟不為功。然經濟統制的實施，必須政府自身擁有相當的經濟實力，方能徹底見效。例如戰時物價的統制，就決不是政府的一紙命令所能收效。過去有好些地方曾經實行過平抑物價的政策，但結果大半失敗了。考其失敗之由，即在實施這一政策的當局自身毫無一貫色，對於市場上的物資供應毫無控制的力量，以致拿平空費，終於不得不宣告平抑政策的放棄。舉此一例，可知國營實業乃是貫徹統制經濟政策所不可少的條件。如果政府自身在一國的工礦交通乃至金融上擁有相當的勢力，足以領導全國的經濟，則私人經濟自然易於就範，而整個經濟建設的計劃也就能够提綱挈領按步就班地見諸實現了。這是戰時不能不認真推行國營實業的第三個原因。

第四、今日中國的抗戰，其目的不僅在消極的救亡，而且在積極的建國。因之，中國的戰時經濟建設，亦必帶有兩重的任務：即一方面必須滿足戰爭本身的需要，他方面又還得要替未來的新中國奠定其物質的基礎。所謂未來的新中國，當然是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如果從經濟的本質上說，就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國家。依據中山先生的遺教看來，民主主義的最後理想，是在實現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亦即所謂大同社會，這種理想是與歐美各國的社會主義者相同的。可是，用以達到這種理想的手段或方法，中國與外國却不盡同。從近代的西洋史中我們可以看出歐美各國之由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乃是一個自然生長的過程，即資本主義依其內在的矛盾規律之發展，一方面造出了高度發展的生產力以為將來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另方面又造出了強大而集中的無產階級，此種無產階級將來即以社會革命的激烈手段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促成社會主義社會之實現。所有這些過程——事實上是一種迂緩而痛苦的過程——都是自然必然的，無可避免的，但是，在中國，別大可不必「亦步亦趨」地追效外國，把外國所經歷的過程照樣重演一番。我們的實業經濟，一開始即採取國營的方式，因之，我們可能於造出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物質條件——高度發展的生產力——之後，即行和平地進到社會主義社會，而無須再

經過一番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的流血慘劇。因為國營實業是造成將來中國和平轉變的橋樑，所收當此舉以抗戰達成建國目的之際，自非認真推行國營實業政策不可了。

三

雖然國營實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應該採取的基本政策，但以實業範圍時所能全部包辦，也不應該盲目地國家經營。或國家一時無力經營。

（一）國家經營是也。凡大專物之可以委託私人經營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其不能委託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此項國家經營之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於此，我們應注意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

（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大專物之可以委託私人經營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其不能委託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此項國家經營之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

（三）現時的國營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於此，我們應注意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

（四）現時的國營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於此，我們應注意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

（五）現時的國營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於此，我們應注意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

應該國營的，政府也可用合辦或出租的方法，委託人民經營。……現在最大的需要便是生產，而且要大量的生產。以供前方後方及輸出之用。假如現在把國營的範圍定得太廣，同時又無力量去經營個個範圍內所規定的事業，那末，國內的生產力反因受了拘束而不能發揮其功能。

翁先生是現任的經濟部長，深知政府現有的力量尚屬有限，所以主張：「除有特別理由者外，政府不因為辦了某種事業，便禁止或妨礙人民舉辦同類的事業。就是法令規定是應該國營的，政府也可用合辦或出租的方法，委託人民經營。」可是，所謂不禁止或妨礙人民舉辦同類事業的意思，決不是說政府對於民營事業即任其自生自滅，毫不過問。恰恰相反，政府對於民營實業的種類、分佈、產量、供應及價格等等，都應該加以嚴格的管制。為求生產的標準化起見，政府甚至對產品的式樣和大小，都應該予以規定。

至於政府與人民合辦實業的辦法，在目前也有提倡的必要。因此項實業，其可與私人經營者合作經營者，或可與私人合作經營者，而政府因……即可減輕國家負擔，並可減輕國家銀行信用。

（一）政府應注意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於此，我們應注意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

（二）政府應注意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於此，我們應注意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

（三）政府應注意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於此，我們應注意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實業，應由政府加以管理，俾得迅速基礎。

### 四

國營實業為今後中國經濟建設的主要方式，其成功與失敗，影響於國計民生，至為深鉅。因此，我們於論究國營實業政策的意義及其與戰時經濟建設的關係之後，不能不進而對國營實業的效率問題加以研究。

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是向來反對國營實業的。其反對的理由之一，即認定國營實業效率之低微。例如馬基斯博士就曾說過：「今日吾國之國有或公有事業，成功者少，失敗者多，一種事業，在國營之時往往萎靡不振，以致收支不能相抵，一旦讓與私人經營，則蓬蓬勃勃，氣象為之一新。」中國的國營實業已有八十餘年的歷史，直到現在，國營事業在社會經濟上還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可是，過去中國的國營事業，失敗者多，成功者少，却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事實。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過去國營事業失敗的癥結何在，我們不能不予以探究，而力謀改進之方。

我國國營事業的失敗，其原因固多，而歸根究底，不外「官僚化」三字。組織無異衙門，事業形同私產，用人惟私，賞罰不明，以致冗員衆多，開支浩大，而真正做起事來，則又感無專門人才可用。辦事重形式而不重內容，重手續而不尚精神，以致完全缺乏商業上的持續性與應變性。又因缺少嚴密的會計制度，營私舞弊，中飽私囊，因緣而生。加以事業易受政治的干涉，人員隨政局的變動而更迭，人太抱着「五日京兆」的心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消極敷衍了事，而狃於者則更乘人事更迭之時，營私舞弊，以求混水

摸魚。在這種情形之下，效率焉得不低微，而事業又焉能不敗壞呢？

過去國營事業的病根既然在於官僚化，則今後改進之道，自當力謀革除官僚化的積弊，而代之以事業化與商業化的組織與作風。或近時各國的公營事業，多以放棄部會經營的方式，而採用社團或公司(Corporation)經營的制度。如像英國的政府公司(Government corporations)，英國的公共托拉斯(Public trusts)，德國的混合公司(mixed companies)以及美國的國家托拉斯等，都是採用這種制度來經營的。這種制度的特點，是在於把所有權(ownership)與經營權(management)分開，如像借用民權主義的術語來說，就是權與能的劃分。公司的大政方針應受主管官廳的管轄，因此政府有「權」；而事業的經營與職員的任免，則集中於經理之手，因此經理有「能」。公司自身為一法人，具有普通商業公司的權利與義務，故可避免衙門化的毛病。這種制度，既可維持事業的獨立性與持續性，同時政府仍可收統籌劃劃之效，確是公營事業的最優等的制度。至於會計方面，我主張採取超然會計制度，由政府會計機關直接委派會計人員，嚴密稽核公司收支財務，計算其生產成本與利潤，審核其資金的使用與開支費用，如此則主持其事者自然無由舞弊營私了。可是，一種好的制度，還得要有好的人員去執行，才能成功。「一人」的條件是任何一種事業成功所不可少的。不過，人的問題歸根還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政治基本穩健，則在厲行法治，證明實情。如果沒有法治的精神，則事業每易為少數人所把持，公營其名，私營其實，而所謂會計制度，也只是一個掩耳盜鈴的玩意兒；如果賞罰不明，則人人將懷消極怠惰的態度，更何有效率之可言。所以進步的政治永遠是經濟發展的基礎。



# 論中國戰時金融統制

——張葆恒——

金融統制的理論，是建立在全體經濟上面，那統制的目的是保持生產與消費的均衡，和維持貨幣價值之安定，由這中心目的派生出來的統制方式，是多方面的，含有辯證的邏輯和動的勢態，本文將以此為分野，對中國戰時金融統制加以各別的論列。

## 一 控制發行

控制發行，是近代經濟組織下必然產生的方案，在戰時更是安定金融底主要方式，對普通銀行言，是防止濫發鈔票，限制信用膨脹，使公衆財產獲得安全的保障。對國家銀行言，則增強其權位，可以調節通貨，使和實際的需要量相適應，維護金融經濟底和平發展。就全體價格言，法幣準備和通貨數量是相對的，必需法幣發行量不超過正貨準備太多，才能安定其適當的價值，若發行無度，則不能維持其正常價值，結果將引起整個經濟體系的動搖。法國大革命時的Assignat，美國南北戰爭時之綠背券 (Green Backs)，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紙馬克 (Papier Mark)，及俄國之舊盧布 (Rouble) 都是由於發行過多，價值低落，招致人民破產和國家財政窘迫的結果。

我國自廿四年十一月四日實施新貨幣政策，即將法幣發行權付於中央，中國及交通三行，其後二十五年更期定中國農民銀行鈔票為法幣。法幣發行權，雖未單一的為中央銀行所獨佔，但已正式歸屬於國家銀行。抗戰前法幣發行準備，維持在五成以上，抗戰

後法幣發行，仍抱謹慎的態度。在戰事發生前的十九個月，平均每月增加的發額為四千四百萬元，而在七七事變後的九個月，平均每月發額為三千六百萬元，此戰前的發行額，還少八百萬元。從二十七年三月起至二十八年十二月止，這期間每月平均增加額為一千五百萬元。這就表現出法幣的發行，已加以相當的控制。以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對外戰爭進行連一年以外，金融仍能安妥如恒，可說是奇跡，而控制發行，就是形成這個奇跡的主要因素。

抗戰週年，法幣發行額增加到什麼程度。是無從查悉，但據財政部公布，直至二十八年年底止增加到三十萬萬又八千萬元，比抗戰前的一個月廿六年七月的十四萬萬又四千萬元，不過增加一倍多，而同時物價指數却升到三三〇，七，在明也升到將近三倍，桂林、曲江都提高到兩倍以外，可知物價的膨脹，並非由於法幣發行增加。實際上在法幣的流通範圍日益擴大，和內地經濟開發，需要籌備增加的情形下，法幣數量的增加，並不會等量地引起物價上漲，因此我們可以肯定，法幣發行，並沒有引起金融經濟發生不良的後果，相反的，金融經濟之變動，却影響到法幣發行的增加。至少最初的階段是如此發展着。也許後來是互相影響，彼此增重其作用，但控制發行，在金融統制上可說是一「平城」之作。

## 二 保護金銀準備

金銀準備直接影響信用及法幣價值，正貨準備減少，可能等量地使信用膨脹和幣值低落，為上項準備的準備，鞏固通貨價值的基礎，在進入戰爭狀態的時期，必然防止金銀的外流，分散和窖藏。並且最後為恢復國際經濟的平衡關係起見，亦得以不動搖金銀準備為上策。

我國貨幣改革時期起，即停止白銀作為支付手段，公佈銀幣銀類兌換法幣辦法，銀幣用與管理規則，二十八年一月七日財政部又核准兌換金銀規則。收兌金銀券同時進行，二十六年九月制定金類兌換法幣辦法，二十七年五月通過實施金類兌換法幣辦法，二十八年八月又公佈收買金類辦法。

保證金貨準備法的特點有二：(一)禁閉金銀市場。限制在市場上自由流通，使不得不售給政府。(二)利用利益心。給予稅費。非提高兌換率，如廣東即會提高以維持金銀法幣增加二給值。

收存金銀，禁閉法幣基礎。對於戰時經濟可說是一件功績。但在上海、漢口和廣州都有外人租借地，有經濟力量相當雄厚的外商銀行，都超然於中國法幣以外的，不但他們手裡擁有的金貨不會被統制，就是中國人民的金貨也可以付息的方式交給他們保管，這種逃避的資金，雖無從去統計，但相信為數不少，更絕對不能相信完全沒有。此外，由於過去政治不統一而來之通貨風潮的影響，及鈔票使用習慣未普遍的原因，使人民對於鑄幣價值固定性特別迷戀，而將白銀收藏起來。埋藏於地下。大抵經濟發展愈落後的內地，則藏白銀的愈多。這些會死藏過的白銀，逐漸乘銀錢比價相差極大的機會，大批出賣，據調查四川鄉間銀洋與法幣暗盤比例，為一與十四之比，雲南這一與十六之比，在廣東，也發生過銀錢與毫券交換比率相當的現象。關於這一點我們認為是政治的而不是經濟的問題。

### 三 管理滙兌

管理滙兌的目的，在滙價的穩定，其手段是限制輸入貿易，減少外幣之需要，防止因心理作用而引起之資金逃亡，以維護法幣價值之基礎和外滙準備的金貨。但在中國領域內有操縱我外滙大權的外商銀行，擁有雄厚的經濟權益，從利益的觀點出發，自然不願接受我們管理滙兌的法令，我們又不能強制他們實行。外滙既不集中於我國銀行，如果自始即施行統制，結果必使外滙黑市的急激發展，從而影響法幣的對內價值，引發國內市場的騷動，和人心的不安。抑尤有進者，在戰爭爆發的初期，不少人相信這場戰爭，會延長到一年以外，以為犧牲一部份外滙，求得大多數國民經濟生活的安定，和抗戰信念之增強，是比較可取。於是從廿四年貨幣改制時起直至全面戰爭爆發的初期，中央銀行對外滙的實行無限制買賣

，使滙價固定於一先令二便士又四分之一的水準。至二十六年十月，上海淪陷，銀行在淪陷區提取，資金逃亡日見增多，當局乃與外商成立「君子協定」，規定外滙銀行供給外滙，祇限於銀行的頭寸，如頭寸供給了之後，即不再向中央銀行請求，一面限制提存及審核外滙用途。只供給正當的需要，但因為請求者多，供給者少，於是外滙市價與法幣的差別漸著，而資金逃亡也隨着增多。至二十七年三月止估計逃亡的資金達七千萬之鉅，於是實在的意味到放任政策之不當，進而出於管理之途。依據滙市變動及外滙政策的轉變，我國管理滙兌可劃分如下各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 二十七年三月十日「偽華北聯合準備銀行」成立，發行偽鈔，圖謀調換法幣，奪取我外滙。我們為針對敵偽的陰謀，維護外滙基金，安定國內經濟信用計，便正式管理外滙。三月十四日公佈「購買外滙請核辦法」與「購買外滙請核規則」，自是日起外滙之賣出，由中央銀行在政府所在地辦理，村在香港設立通訊處以為承辦，由商人及普通銀行因正當用途，請核外滙，由中央銀行外滙審核處辦理。各級政府機關公共所需之外滙，則由各該主管機關檢送證件，由財政部特設之外滙審核委員會酌量核辦。凡經核准者，概以法定滙率售給，同時並頒發商人運貨出口及售結外滙辦法，按照該項規定，桐油、豬鬃等二手物類貨物外銷所得外滙，先期預售與中國及交通兩銀行，否則，交通機關不予收運，海關不許出口。但上海租界，是國際自由買賣外滙的市場，敵偽將被括而來的法幣大量推進黑市，套取外滙；外商為了利益所在，也將從前成立的「君子協定」廢棄，從事外滙買賣；節輸入增加，入口商人轉向黑市購進；外滙市價與法幣相差太遠，出口商人不願將所有外滙售給政府。由於正當的與不正當的外滙需求急激增加，法幣的市場滙價便從一先令二便士半降至一先令一便士半，五月再降為十一便士六，七月為九便士，到八月更降到八便士左右。

(二)第二階段 二十八年三月敵人在北部各省禁止法幣流通，更在上海設立「偽華興銀行」，奪取外滙更為劇烈，同時威脅外滙的其他諸因素，又並未剔除，滙價乃急激下跌。在我方因為滙價

過分低跌，足以影響法幣信用，在英國也有損於其經濟利益，於是聯合成立匯兌平準基金，由滙豐銀行及麥加利銀行担任五百萬鎊，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担任五百萬鎊，共一千萬鎊，無限制供給黑市需要，維持匯價於八便士又四分之三的水準。這一水準保持至一年之久。

維持匯價，原本可使國內物價不致暴漲，但便利資金逃亡，便利敵人奪取外匯，有利於進口，有損於輸出，適足以喪失大量外匯基金，使法幣價值根本動搖。對維護法幣言，是「捨本圖末」，對敵偽言，無異「竄寇以糧」。

(三) 第三階段 廿八年六月起，外匯平準基金感受重大之威脅和損失。於是放棄維持黑市固定水準的政策，至六月十日匯價便從八便士二五降至六便士半，後因敵人奪取更烈，乃宣佈停止拋售，至七月十八日再度下降至四便士左右。

放棄固定的維持黑市，並不可能防止敵人奪匯，亦不能防止資金逃亡，但匯價低跌，可使外匯基金的損失比例地減少。

(四) 第四階段 二十九年以後，嚴令執行限制携運鈔票辦法和貨物出口結匯領取券類辦法，並着重限制提與實屬新匯制制度，這時期外匯管理方案的要點如下：(一) 出口商人售給外匯得領取法幣及中交兩行掛牌價格之匯票。(二) 入口貨物按照法幣與掛牌之差額加課平稅。(三) 限制奢侈品和非必需品進口。(四) 不論公私請匯統由財政部外匯審核委員會辦理。(五) 將外匯申請和售給地址由香港移向重慶。從廿九年夏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止，匯價始終盤旋於三便士半之用。以長期穩定的趨勢，自然是由於這一價格是屬於法幣的實際匯價。

第一時期的外匯政策，是屬於半維持半放任的性質，其優點有三：第一不強調人為的力量，順應着匯兌市場的自然水準，加以調節，使匯價不致急激變動，免使法幣信用受匯價的急激影響而呈不規則的降低。第二着意於法幣之給付和課稅，可以維護對外貿易，使不致過度逆調，同時可獲取更多的外匯。第三減少資金逃亡及敵人奪取外匯的效能，減少了匯市的壓力和外匯基金的損失，第四

陷人民為期得法幣行使，而又不受到匯價的損失。可能將外銷產品運經內地出口，從而增加外匯基金。現在戰爭擴大，為我們消滅了黑市，管理外匯，可說是特種景。但事實告訴我們：法幣的匯價，始終盤旋黑市附近，外匯管理，并未收到最大的效果。這是半殖民地經濟的必然命運。

### 四 控制信用

從上海、南京、漢口、廣州相繼退守後，產業收縮，物價上漲的象跡顯著。貨幣價值的心理作用，驅使着淺識而貪利之徒，作資金逃亡的舉動，促使匯價的降低，在這種情形下，實行通貨緊縮，是必需的方策了。在理論上，一國的貨幣及信用，遠勝於使物價上漲的程度，足以擾亂了市場的時候，祇有出於緊縮之一途，才可以安定金融。緊縮銀行信用，一般運用的方策是：增重票據貼現的效能和公開市場的活動，這是中央銀行管理信用傳襲的武器。一般進步的國家，都是有效地運用着。

當市場資金膨脹的時候，中央銀行提高貼現利率，其他各銀行一般利率亦即隨之上漲，使新的借款，無從產生，信用受到限制，資金乃不致膨脹。堪立夫委員會 (Cunliffe Committee) 關於這一點，曾有如下的說明：「銀行貼現率提高，市場所受之影響，即為利率之一般上漲，及信用之受限制，新的企業，因此擱延，建築材料，及其他生產貨物之需求，亦大減少，業務停頓，對於消費物品之需求，因亦減縮，儲藏貨物者，向多借款經營，今利息負擔增高，倘重新借款尚不十分困難，或期望物價不致過分下跌，勢必將貨物在疲弱之市場上，盡力推銷，其結果終使國內市場之一般物價下跌」。

中央銀行將銀行承兌票和政府證券盡力出售，那市上流動資金，將逐漸被吸收，作為商業銀行信用膨脹基礎之準備金，從而減少，不得不收縮信用，以應提存，這樣社會資金膨脹，即獲得調節。在我國新貨幣政策實行時，即規定貨幣之發行權付予銀行管理

委員會，並定銀行對其負債項下之存款，設一定成分之準備金，以存款之形式，存於中央銀行，對於信用之控制，已獲得若干條件。但按照我國銀行制度，運用金融政策的權力并未集中，運用之技術能力和經驗又不豐富，本身條件不具備，已難於進而管理。同時短期信用工具之商業票據和銀行承兌匯票，并不發達，組織完善之票據市場，成交票據之票據亦不發達。貼現公司，又未成長，這說明我國金融發展是如何落後，使中央銀行的管理政策，無法實行。因此，信用控制，在我國來說，是另一套了。

我國現時信用控制的方針，主要的內容，歸納起來有如下五端（見非常時期管理銀行暫行辦法）：

(1) 規定銀行以普通存款總額百分之二十為準備金，存入四行之一。

(2) 規定銀行運用存款，以投資生產事業及聯合銷售事業為原則，承做放款應以正當商人為限，以杜絕囤積居奇。

(3) 禁止日期必需品抵押放款之轉期。

(4) 規定銀行不得直接經營或囤積貨物，並不得以代理部或信託部名義，自行經營或代客買賣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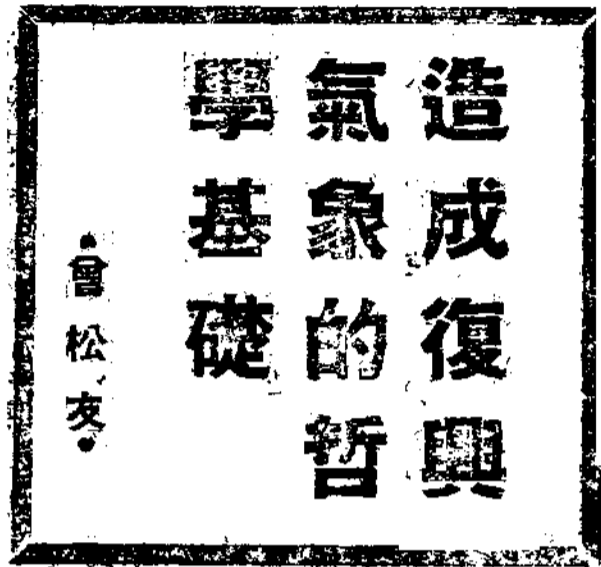
上述(1)項是銀行信用之量的控制，(2)(3)(4)各項是銀行信用之質的控制。其目的是導社會資金進入生產部門，而減輕商業資本之活動，使物價安定，金融穩固。然而，尚有困難的問題，如第(2)項，規定銀行存款之運用，以投資於生產事業為原則，可是，項原則的實現，却有如下三項的困難：(甲)一般生產事業如工業、礦業、農業，都是利息較薄，期則較長，風險較大，故生產事業人並非普通金融機關願意投資的對象。(乙)銀行存款定期，長期者少，而活期、短期者多，大量存款都是活動資本，銀行需要大量現鈔，應付提存，以免資金呆滯，信用動搖，如此，自不能以大量資金運用於長期的生產事業。(丙)戰時商業投機，利潤豐厚，收回迅速，增大資本的邊際效能，對銀行界發生極大的影響。又如第(3)項，禁止日期必需品抵押放款轉期目的，是限制變相的囤積居奇。但商人狡猾異常，常欲擴大資本之運用，貨物抵押，於

甲銀行押期滿後，其利息銀行請收轉轉轉，延緩利息，實屬囤積居奇，因物價高漲，所獲利息更厚，而所付出之押款利息甚微，商人正樂為是，而銀行之信用則無形貶損。再如第(4)項，限制銀行不得經營商業，但銀行仍可改用花號，從事商業運輸和商品囤積，不當營業。

要是施行信用控制，首先要改善銀行組織，加強中央銀行的權力，使成爲真正的「銀行之銀行」，綜攬中樞，萬端景仰，自容易統馭。其二，須要限制銀行設立，數目愈少，越容易統馭。其三，須要在內地創立資本市場，各種商業證券的發行，由政府力量，担保該項證券的本息，使易於流通；四是信用統制機構改造原則。其四，銀行存款準備率，規定中央銀行有提高或減低之權，適應信用變動之情況。

### 五 調節資金

調節資金的目的，是導社會資金向正當之途發展。一方面關係於金融本身的安定，另一方面關係於生產事業之發展。照目前情勢言，假使社會資金，支配得當，工、農、礦、商等各業資本的分配適度，物資供給充足，機械就不容易產生。過去我們在調節生產資本中，農業放款最爲顯著，廿六年九月十月有各省市辦理合作貸款的規定，二十七年軍事委員會頒佈戰時合作農貸調整辦法四項，行政院又通過擴大農村貸款辦法六項，經濟部也公告農村貸款辦法六條，二十八年初又頒發辦理合作金庫原則數項，級級致力於農業放款。至於工業合作，亦力爲資助，年來工合運動，進展頗爲神速，實爲功績之一。他如扶助工廠內產，辦理聯合產銷等亦無不以扶助生產爲目的。然而，強制而使社會膨脹的貨幣資本，移向生產部門的措施，却未有所聞，事實上資本的所有者或經營者，並未有稍爲放棄營利主義的觀念，而着重於國家經濟的發展，產業投資的利潤比本上商場的利潤，工農放款的利率比本上商業借貸的利率；同時利息和利潤失去正常的比例，以儲蓄爲吸收資金的方法，也鮮成果。於是乎依據正當的需求而進行調節完全不可能。



民國廿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李主席在省府擴大紀念週的詞中，認為本省的政治工作，由於「空來的粉力」，可說到了相當的穩定。無論敵人怎樣的進攻，漢奸怎樣的搗亂，再不能動搖本省政治的基礎。但是政治基礎雖然穩定，如不進一步再求開拓，結果仍是站不穩，因而提出了一「廣」政治新階段——作為一個劃時代的號召，而特別指出：「我們要踏上劃時代的新階段，我們必須造成劃時代的復興氣象，更必須建立劃時代的計劃政治。復興氣象是計劃政治的靈魂，計劃政治是復興氣象的軀殼」，復興氣象是計劃政治的靈魂，亦即是展開廣以政治新階段的哲學基礎；造成復興氣象與展開政治新階段的實施計劃政治是不能分離的。因此，如何

使這三者緊密起來，配合起來，和結合起來，便成了我們目前施政問題的中心，而如何造成復興氣象，又成為一個問題中心的核心部份，所以李主席說：「故我們認為廣東現在的政治，要有一個劃時代的新階段，造成一種新的氣象，以激發精神，推動應政」。因此，造成復興氣象的實踐問題，我們應有迅速提出的必要，因為只有復興氣象的造成，才能順利地實施計劃政治，而展開本省的政治新階段。

造成復興氣象的提出，不只是為適應目前的特殊環境而為實行抗建大業所必需，而且還有深刻的革命的哲學基礎。因此，在沒有說到造成復興氣象的實踐問題以前，我們來把造成復興氣象的根本原理，作一個簡括的說明。

造成復興氣象的根本要素，依照李主席的指示，是（一）要有重大至剛的正氣；（二）要有公而忘私的精神；（三）要有自強不息的努力；（四）要有以新奮鬥的生活。這四個要素的提出，「是從新生活運動和國民精神總動員與政治的進展而來」，換言之，李主席的造成復興氣象的四個要素，是緊接着總裁的指示而提出的，而總裁的指示又是和「總理的遺教」一致的，這就是說，造成復興氣象的四個要素是三民主義性的，是由於三民主義的革命原理引伸出來的。

「至大至剛的正氣」是人人所共有的民族正氣。實行國民公約，推行新精神動員

我們要求資金調節發生預期的效果，原則上必須從改善金融組織做起，並且應按照國防和民生的需要，所擬定的生產計劃，來全盤支配資本的運用，這種資本運用的分配，是不能站在利潤上去打算，祇能站在國家利益去設想，同時戰時過分利得稅，應加緊課征，以剋減不正當資本的轉運，然後金融統制，始發生相當效果。

## 六 結論

綜合地說，過去的金融統制政策，（一）多從絕無條件的立場出發，而無犧牲精神，絕大多數的舉措，雖有干涉人無經濟活動的意義，惟對於利潤和利息之獲得，既無嚴格的限制，而對於在適合需要的條件下不以收益為投資的目的，亦無規定，故雖云統制，而實十分鬆懈。（二）有勸導之功，而無強制之力。從正貨準備集中，發行集中，到存款準備之規定和銀行業務方針之確定，從消費到生產，各項規定的含義，都多利用利益心或愛國心，勸誘引導，故一般金融活動，仍獲得寬限的自由。因充分表現出積極的性態，而無積極的作用。備用控制，資金調節，呈現極度的被動，實為這種特質最好的證明。（三）多應急應變的抵抗性，

便是正氣的提倡。……李主席：廣東政治新階段）民族正氣是民族復興的基本前提。民族的正氣如天地的正氣一樣，其為氣也至少至烈，而為乎天地，民族沒有正氣則民族亡，天地沒有正氣則生靈絕。負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個人正氣的實踐。由個人的正氣引為民族正氣就是可歌可泣的犧牲精神，是戰而不退的鬥爭氣魄。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就是民族正氣的實踐。「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是民族正氣的根本原則。至大至剛的正氣首先是民族的，因為民族的組織，在人類的生活分際中，是最接近最切實際的人民生活共同體，離開民族的立場來移談國際主義是狂妄，是無知，是罪惡。所以「至大至剛的正氣」其根本的意義是以民族為依歸的，是由於民族的立場而導引出來的，而這種正氣的造成，是「不應為士大夫的金玉珠寶，而應為一般民衆的布帛菽粟，必要這樣，才能普遍地形成復興氣象」。（李主席：廣東政治新階段）

「公爾忘私的精神」是反自私自利的企圖的，「假公濟私的，當然是罪惡，不用說了；公私兩便的，結果必致分散的精神，減低公的力量，亦屬有害於公。所以，我們要提倡公爾忘私，要使一般人都知道「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政治新階段）總理說：「人類是以服務為目的，不是以奪取為目的」總裁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都是指出「公爾忘私」的重要性

及其真實意義。人類是社會的動物，是民族的一個組織細胞，每一個人的全部生活，都是供給於民族與社會的，一分錢也不能脫離民族社會而存在，以私害公或假公濟私的作風，不只是反社會的，而且是反良心的。在民族的鬥爭生活中，如特別出私利無顧公益，則必然損害戰鬥的生活體制而鬆懈戰鬥的精神，因而則必然直接危害民族。所以「公爾忘私的精神」在國家到了存亡最後關頭的時候，實應為社會風氣，而不應祇為「美的名詞」。（廣東政治新階段）

「自強不息的努力」是篤行勵功的根本法則。揚經士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總理說：「有志者事竟成」（孫文學說）

總裁說：「唯有篤實行，才能事事精益求精，實事求是，且必始終專一，貫徹到底，決不會有粉飾張皇，苟且敷衍的習氣。」（行的道理）所以「自強不息的努力」在個人言，是建功立業的根本，在國家言，是復興國家的源泉，宇宙由於自強才有「生生不息」，國家社會由於自強才能進化不止，自強不息就是力行貫徹，不但個人要自強不息的努力，而國家民族尤其需要自強不息的精神，我們要以自強不息的精神轉變為社會的風氣，首先就需要委身於大時代中的公務人員能够拿出模範作用來，「我們要把自己的血汗來換取國家民族的幸福，非達到預期的目的，決不休止，才不愧是大時代的公務人員」。（廣東政治新階段）

而少進取力。從限制提存，禁止運鈔出境，限制口岸匯款，審核外匯，設立外匯平準基金，到貨物出口結匯領取差額辦法，每一規定，是必由於客觀事勢之逼迫而後計劃，却非從整個經濟組織上着想，按照預定的目的進行，更非針對敵我經濟的關聯性，而作壓抑敵人的固有的經濟力量，因而處處表現出被動的姿態，而無主動的性能。保護，貨準備和管理外匯未獲得應有的效果，是這一特質的明證。這些性質的存在，實在是金融統制的弱點。

吾人以其因金融政策過於寬鬆，而使其尚未成為統制，則毋寧說是環境使然，難求能為嚴密的統制，來得實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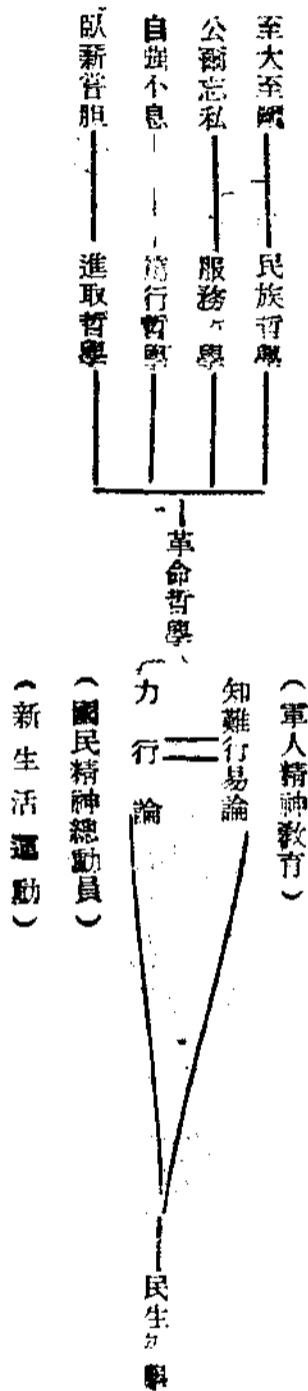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際經濟關係已經改觀了，在目前後方環境而論，次殖民地的經濟性質可說已經剷除，此後金融統制將純為內部的問題。這可能使金融政策之獨立和統制辦法之推行，獲得自立的機會，原則上我們希望能重新調整金融組織，加強統制機構的作用，並針對着安定貨幣內價，增進社會儲蓄，防遏商業投機，和調劑生產資金四項目標，重新決定金融政策，切實執行。

「臥薪嘗膽的生活」是刻苦的、進取的、堅毅的、圖強的生活，「就是刻苦自勵，圖強奮鬥的精神」(李) 總裁說：「我們抗戰却敵的武器，是要我們有不怕死，不怕苦，不怕難的精神，……我們一舉一動，一滴汗，一滴血，隨時隨地都用來求國家民族光榮獨立的生存。」「每一個人要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為痛苦同胞盡仁愛，對一切的人和事重信義，還要盡一切的戰鬥力量，在這個紛擾黯淡的世界中，求取真實永久的和平。……我們應：正視國家的艱危之嚴重反省我們的責任，……改正醉生夢死，自暴自棄的生活。」(關於精神總動員)，臥薪嘗膽的生活，應當作為戰時生活的基本精神，沒有這種刻苦圖強的生活質素，則要爭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復興是不可能的。所以臥薪

嘗膽的生活，應當作為戰時的生活方式，以適應戰鬥的體制。「臥薪嘗膽的生活」，正是依照這種需要而提出的，其根本的精神是以民族的悠久生存為依歸的，「在危急存亡的關頭，絕不容許我們有泄泄沓沓而且偷安的萎靡氣質，對於精神必須不斷的刺激，對於生活必須加倍的刻苦，才能打破艱危的局面，負起大時代中抗戰建國的責任」(廣東政治新階段)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造成復興氣象的四個基本要素，歸納起來，是出於民族的哲學、服務的哲學、進行的哲學、服務的哲學、進行的哲學、進取的哲學是互相重複的，互相聯繫的，所以作為復興氣象的四個要素，亦是互為內容的，互相關係的

在牠們之間是有着嚴密的連鎖作用，而其基本的精神是以民族為本位的，是以民族至上論即以民族的哲學為其基本的核心，而民族哲學為基本的復興四要素，又是由於國民精神總動員和新生活運動而來的，總裁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及新生活運動又是由於「總裁的力行哲學演繹出來的，力行哲學和「總理」的「知行易論」——軍人精神教育」一致，而力行論正是知行易論的發展。知行易論與力行論就是三民主義的革命哲學，三民主義的革命哲學又是由於三民主義的基本原理——民生哲學引伸出來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造成復興氣象的四個要素，是三民主義的，是由於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演繹地演繹出來的，為便於明瞭起見，特圖示如下：



杜定友

# 行政與技術

「行政」與「技術」，在一般人看來，是截然的兩件事。一種觀念是根本錯誤的。因為有這種錯誤觀念的存在，使我們對於一些相對的名詞；如理論與實際，人事與政治，做官與做事，等等，加重其對立性。流毒所至，乃至祇有理論而無實際，祇顧人事而輕政治，祇於做官而不是做事。在送政治新階段，建國過程中，實有申明辨別之必要。

## 一 理論與實際

「行政」二字，在普通看來，偏於執行原則政策方面；「技術」二字則為事務之管理。因此行政屬於理論方面，技術屬於實際方面，而「理論是理論，實際還實際」是一般人的口頭禪。理論與事實，真距離這遠麼？不。當國父提倡革命，演說實業計劃的時候，誰不說他祇有理論，而無實際。甚而至於說他「車大炮」。但是現在看來，那一句不是實話了。那一件事，不帶實行？祇是我們不肯聽，不肯做才是罪過。所以當時，他老人家也喟然而嘆：「謂予所主張者，理則太公，不適中國之用，家口饑金，一時風氣；同志之士，亦悉感焉……其所以然者，非盡關乎功成利溥而移心，多以思想之錯誤而懈怠也。此思想之錯誤為何？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也。回顧當年，予所耳提面命於革命黨員，而被河漢為理想空言者，至今觀之，適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當為民國建設之資材也。」（心理建設自序）。

可見理論與實際，原是一件事的兩面。所有正確的理論，沒有不能行的。事而不行，是因為我們未能真知。「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這是孫文學說的主旨。但是「知」就是理論；「行」就是實際。「知」與「行」是一貫的。我們還說「理論是理論，實際還實際」，顯然是「知之與艱，行之惟艱」的遺毒。對於一般事理的批評，未能「從實自白」，不是「總理信從」應有的態度。

理論與實際，應該是「一致的」。若是理論而不能施諸實行，則理論必有缺憾。實際而不符原理，則實際必有變動。我們祇能補其缺憾，糾其異動，而兩不能任其矛盾之存在，而承認理論與實際，可以分道揚鑣，背道而馳。比如我們對於一般學校畢業生的批評，我們常說：他們在學校所學的祇是理論，而一到社會工作，實際上就大不相同。這種意見，最為普遍，以為是理所當然。這不帶承認學校與社會的脫節，而以為這種脫節，是應有的現象。既知其脫節，而不去改善，而反為承認其既成事實，這真是教育上一大錯誤。學校的目的，在製造人才。而所造之人才，大家竟認為不能適應社會上之用，這不是一極大的缺憾嗎？一種缺憾，我們若不謀改善，反而承認其為事實，則學校與社會，永遠脫節，理論與實際永遠隔離，這是多麼危險不幸的事呵！

這裏，教育的方法，實有改善的必要。作者在大學研讀圖書館學的時候，那三年之中，並不感覺在讀書，而祇知在館內作工。自選圖書登記編目以至出納裝訂，每一部份工作三數個月，並不是實習，而是實際做事。每一部門，更詳研其理論，考其制度，以資比較。而以純粹理論和歷史方面的書，作為課外閱讀。並有專門教授，從旁指導。所以在學校好像工廠一樣。大部份是工作，小部份是上課。到了畢業的時候，對於將來所任的工作，一點不感覺生疏。而且在圖書館管理上，每一件事務，都親自辦過，所以有充分把握。在學校和出校門，一點不覺得異樣。而且平日受師友的薰陶，對於自己工作前途，有無限熱情。成竹在胸，駕輕就熟。所苦者不過缺少師長的耳提面命而已。所以這種教育絕不會在實際上，有所隔闕。而沒有祇是理論，而無實際的弊病。學校既是製造人才之



所，自不能閉戶造車。祇可惜現在閉戶造車的學校太多了，無一一般社會有此論！

社會與學校的不同，是因為環境各異。但是社會環境是誰造成的？移風易俗，是誰的責任？我們不能以為社會是如此，我們就得隨波逐流，而自以為適應環境。同流合污，而自以為合理。不知教育負有改造社會之責。環境愈劣，正是士大夫奮發有為之時。現在社會上負責的人，何嘗不是當年學子？為什麼一出校門，踏進社會，就兩者相去如是之遠？自己不能令其所學，施諸社會，環境困難，不能刻苦奮鬥，反而承認學校是理論，社會是實際，二者不相銜接。但實際上所謂學校與社會之不同，不是理論與實際之不能一貫，而其中阻障者，是行政與技術問題。而行政之中，最重要者為人的問題。

### 二 人事與法治

現在社會辦事之困難，不是學理與實際不能相提並用，而是人事應付之困難。教育之所以失敗，並不是因為所教所學者，全不合用於社會，而因為學校為人的環境，與社會不同。現在在社會上辦事，要七分對人，三分對事。倘若人事問題可以解決，則行政效率可以增加百倍。但是人的問題，為什麼這樣困難呢？因為社會未臻於法治。一切章程標準，都是紙上文章。以為「徒法不能自行」，就以人為重，以法為輕。不知執法人，也應受法律的管束，因為法是公意。若是人人都能按步就班，照章執行，祇要立法得宜，行法絕無困難。這、治與法治問題，在政治學上，已有多所論列，不必再贅。這裏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是因人事屬於行政，而行政與技術，往往不相聯繫，因此人事與法治，也不相聯繫，而構成這嚴重的人事問題。

以事實為例：比如圖書館的借書規則，訂明圖書借出，應以借書證為憑。好容易行現狀的收支，以有借支票為憑。這是法律，也是技術。因為圖書和票據的管束，是一種專門技術。一種科學的制度。借書人是否有借書權利，應先有借書人的資格。而借書人的

資格，就以借書證為証據。故無借書證者，則不能借書。例如銀行支票，如不預繳印鑑，依式填寫，是無從支款的，其理甚明。但是一般人却不要印鑑，祇憑領借書證，而竟領下一個條子，或來一封公函。公文是行政，條子是面子，面子是人事，人事是私情。因私情，可以不顧手續。因行政，可以左右技術。倘若行政的款子，可以不顧手續任意提取的，那還成樣子嗎？可是社會上有許多事，是不成子目的，也就是個原故。辦事的人，若不顧情面，照章執行，則發生人事磨擦。祇表表證，不受公文，則認為不重公事，不符行政。於是祇有不守章則，破壞制度，而敷衍面子，這叫做應付得體，這叫做適合實際。所謂人事問題，如此而已。以圖書館或銀行而論，整個是一件專門事業，是一個技術機關。技術機關，則有一定的法則，一定的制度。整個技術制度之下，行政是技術的一部份，人事是行政的一部份，而現在竟以七分對人，三分對事，其指本逐末，於此可見。

以用人而論，本來是行政之一，但是各機關對於用人技術，不甚講究，用人標準，又不嚴定。所感難於應付的，是親友的介紹，大人先生的條子；因而縱無標準，增減無常。四月七日桂林大公報載：黃子席說「本府職員，一為人員太多，二為工作太少。人員多則冗，工作少則閒。……關於自閑，忙者自忙。……由此觀之，全府職員似嫌太多」這種情形，在有組織有工作標準的機關，是很少的。比如郵局用人，他們有一定的標準。一、郵局二等局，視業務數量而定。在外國機關，也沒有完員這一回事。因為他們用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用途，有一個人的工作。工作不力，則不顧面子，不顧人情，加以斥退，所以行政效率，自然增高。這種無淺的道理，我們為了舊習的束縛，要面面俱到，要顧背景，要顧靠山，於是應付應付，要顧關係，要運用手段，這謂行政，如是而已。祇管偷天換日人事管理，科方法，訂定章則，還是不了人事的牽制。無論如何，都長時間，用強詞大方面。無怪事業無成，用人無效。人事管理，是技術問題。往往因人事關係，置法理於不顧，將人事管理，當作技術問題，於是行政以爲一回事，技術

「一國事，因而把技術，就行政。以行政列為首要，所以各種事業，無法約上軌道。因為專人而不專事，於是有所做官而不辦事之弊。」

### 三、做官而不做事

因為行政與技術，常被視為兩件事，而大家注重行政，不重技術。擔任行政的是官。擔任技術的是事務人員。大家都要做官，而不願當技術人員；於是做官而不做事。國父說：「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如果一件事業能成功，便能够大名。所以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這「教訓」，大家仍多未能體察，趨炎附勢，大有其人。

在社會上辦理公共福利事業，是政府職責之一。辦理圖書館事業，也就是福利事業之一，任職圖書館者，亦為政府工作人員。國父說：「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把那些專門家，不要看做是低級而尊貴的總統總長，只把他們當作是趕汽車的車夫，或者是當作看門的巡捕。」（民權主義第六講）官員原是人民的公僕，做官原是為做事。但是大家還是迷於虛榮，把實際事業不放在眼內。於是專門學者不任專門事業，而奔趨仕宦之途。不知政府猶機器。機關管理為專門技術。政府各部門，更屬專門之專門，尤賴專門家主持。若以專門事業，棄如敝屣，則政府還有能嗎？

反而言之：一般專門家，雖有心於專門事業，但受了所謂行政的牽累，每天看公文辦公事，講交際，講應酬。把全部時間，都費在這些無謂的事上，還有什麼餘暇，去辦理專門的業務呢？比如現在的學校，當校長的，理宜對上學校的內政，教育的方針，訓練的計劃，學生的生活，學業的增進，科學的研究，多所盡力。乃現在做「校長」，就逼得做官。把全部時間，放在所謂行政上。於是當校長的，祇要在校長室裏批公文，會來客，大半時間，跑在外面參加會議，走動走動，與權貴周旋周旋，一點兒沒有學校生活，教育

意味，更不必問其學問如何。資格如何？學業，反被目為迂腐。祇求於行政上，能應付過去。這「教育」，實如大海。這是教育前途，一大隱憂。

所以做官與做事，若不能以事為重，以官為輕，（換句話說，應以技術為重，行政為輕）則社會上官愈多，事愈少。專門家不能站在自己崗位，努力於專門所學的事，則政治與事業分離，政府將建築在沙灘上，其危險孰甚？要知做官是聖做事，做事就是做官。如做專門事業，不是做官，則太人做官，而不做事。那麼社會上的事，還有人做麼？專門家也不要妄自尊大，非有一官半職，不足以誇耀。大家都以任行政為官為榮，以理首專業為辱，則社會還能進步嗎？但是現在的情形，却是如此，為的是一般人對於行政與技術，政治與事業，觀念上有根本的錯誤。

### 四 結 論 —— 政治與事業

行政與技術，擴大而言，就是政治與事業。在一個機關以內，可以分為行政與技術，在一國政府內，就擴為政治與事業。欲明行政的意義，先要明政治的界說。國父說：「政就是衆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民權第一講）又說：「政，是機器。行政機關，就可以說是行政機器。現在歐美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用專門家。對於政治，也知道用專門家。」（又第六講）這里所謂專門家，是政治學者嗎？不，這里專指各科的專門家。比如一個省政府，分民財建教。其中有許多部門，就得有許多專門家。這些專門家，就負着整個政府的行政工作，也就是政府的官吏。這些官吏，既屬各有專門，則各有專門的技術。行政不過是整個技術的一部份而已。

那末，政治學是什麼呢？政治學是綜合的科學。也可以說普通常識之一。國父說：「許多人以為政治是很奧妙很艱深的東西，是通常人不容易明白的。所以中國的軍人，常常說：我們是軍人，不懂得政治。如果說不干涉政治，還可以講得過。但是說不懂得政

治，便不通了」。(民權第一講)可見政治是通常科學，是人人都應有的常識。現在常聽人說：學法律的將來做律師，學政治的將來做官，這是多少有錯誤的。因為政治是綜合的學科。若是純粹研究政治學，則範圍更狹。政府中沒有一個部門可以單用的。若是研究政治的各方面，則財稅建設，無所不包。但各部門既各有專門，非政治學者所能勝任，所以學政治的，最多也祇能當「不帶部大臣」。其餘各門，仍應由各該專門學者擔任。因為一般人不明自政治的意義，以為學政治的，就是學做官，於是往往以官為另一種學問，以行政為另一種方法，以官員為另一種人。行政與技術的分歧，其原因在此。

在現代的政府組織當中，以省政而論，分科已極專門。民財建設，各有所屬。而省主席是一個領導者綜合者，省務會議，是各專門部份溝通調協的機關。其組織極為完善。除了省主席之外，沒有總管行政的官。至於國民政府各部，設有常務次長政務次長，原係多黨政治的制度。因為一黨執政的時候，要施行該黨的政策，所以各部部長及常務次長，以在朝黨員為限。至他黨執政的時候，各部主管人員，必定連帶去職。但政務不能中斷，專門事業，不能隨時變更，所以有政務次長之設，完全負責技術上的責任，不因黨政而有所更動，然後政府始不至根本搖動。行政與技術的劃分，其標準在此。在這種制度之下，那些負責黨政的人員，方可稱為純正的行政官吏。但是各部正常的政務，仍操在專門家手裏。這種制度，與現在本國的政治情形，和外國頗多不同。因為我們祇有中國國民黨。而中國國民黨，是中國權的繼承人。其他在野黨，雖或存在，但無政權承擔可言。所以我們沒有在野黨之分。我們的黨義和黨政，是永遠一貫的。所以政府中的官吏，祇有個人的選制，而沒有黨權的更替。因此行政與事務是一致的，根本沒有區別之必要。所以除了技術之外，沒有所謂行政。

我們明白了政府的組織，在省的方面，根本不分行政與事務。在部的方面，雖有常務與政務之分，但和多黨政治，根本不同，所以行政與技術，也不應有什麼分別。外國的政治，根本未臻完善。

多黨政治，更不適用於中國。尤其是政治哲學，我國原有一貫的理論，非外國政治家所能望其項背，彼在外國學了一點皮毛，而不熟諳三民主義者，根本不懂得中國政治。在三民主義裏，整個政府，是一部大機器。整個政治，是一種技術。官吏是有能的人，人民是有德的人，這種能分治，是國父在政治學上一大發明。而有能的人，就是專門家。專門就是技術，技術就是事業。比如理財是一種技術，也是國家一種事業，非有理財專家，是絕對辦不好的。理財既屬技術，就無所謂行政。至於理財的政策，財政的方針，為一般人所誤認為行政者，實應取決於黨，取決於中央會議，及最近之國防最高委員會。故各部門日常業務，屬於技術，可無疑義。

在行政上，主管長官，所難於應付的，是各種會議。各機關所以設有各種會議，原是集思廣益，為會議機關，而不負行政責任。方便執行的人，有充分之自由。國父說：「祇要他們是有本領，忠心為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大權，付託於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由他們做去；然後國家才可以進步」(民權第五講)會議之設立，重在決策及溝通各專門部份的工作。但是現在各種會議，有許多變成「代議政體」于行政上許多牽制，發生許多人事問題。這是需要注意改良的。因為有這種代議制度，一般人就認為行政，好與行政是要管理而限制技術的，因此大家誤認為行政是技術。

至於各部門之中，亦有所謂行政者。例如文書會計庶務人事等，為組織與利計，可以「行政」二字包括之。但分析言之，仍各有專門。自總制會計制度實行以後，會計已成專門科學。有訓練專門會計大學專科設立，非專門人才不辦。其餘文書庶務人事等，亦應有專門訓練，方臻完善。各部門有專家管理，業務方能納於正軌；故此亦為技術問題。由此可見，各機關並無純粹行政之一部門。至於各機關的首領，主應為技術人才。對於整個部門的業務，有整個研究與全部技能，方能勝任。比如以圖書館以論：當館長的對簿，板本、購訂、裝訂、登記、分類編目、流通、參攷、原則上技術上，均須熟諳，然後能分配工作，考核成績，計劃改善，惟進業

務。在整個圖畫館來看，行政工作，包括文書會計庶務人事等，不過一小部份，若是以前長為行政官吏，對於館內工作，不能贊一詞，不能親自動手，訓練員工，示範工作，則這種館長，等同木偶。發號施令，以一己之私意度之，則館務能發展者，未之有也。圖書館如此，則其他各部門，亦何獨不然？可是現在的機關，因為誤認行政之重要，主持的人，都是門外漢，政府事業之不能發展，其原因在此。

普通所謂行政，多指公事而言。而公事，則多指公文而言。故通常所謂不備公事，則指不備公文。公文在我國行政上，固屬重要。但事實上，亦有過甚之處。外國政府，也一樣的辦理政務，他們除了外交照會政府公佈等，另有特殊格式外，其他政府公文，以公函表格行之。並沒有所謂公文程式那一套。我們公文之所以成為行政上一大障礙，其原因在：一、不能執行章程，二、不能運用表格。現在各機關所訂章程，不為不多。若是能切實執行，運用表格，則現行公文，可以名却一十年。而所謂公事，也可減少。這也是技術問題。

各機關各有專門性質，則公事往來，亦應大部份有專門性。辦事人員，也應大部份為技術人才；然後業務得以發展。而現在各機關，辦公人員多於技術人才。而辦公人員所做的，都是一套因循此「那一套」。除了公事之外，就沒有其他。此所以機關變為衙門，工作人員變為官吏，而官僚浮沉，今日之東，明日之西，把整個專門機關，化作普通行政機關，今天可以辦民政，明天可以辦教育。此動愈多，升官愈高，官職愈多，聲望愈隆。我國政治之不上軌道，其結在此。

現在欲求政治之進步，社會事業之推進，則須理論與實際合一，人事與法治兼顧，做官與做事一番，政治與專業並進；才能組成現代國家，合於三民主義之原則。否則行政與技術背道而馳，專門家不能站住崗位，努力本位工作，一切庶政，操之於另一階級。以為政治是另一套把戲，非一般人所能了解。以作官為另一種身份，非技術人員所能勝任。則行政與技術，政治與專業，分崩離析，實

為建國前途一大障礙。行政與技術分離則工程專家，不能當工廠廠長，圖書館專家不能當館長，教育專家不能當校長。於是對於所謂行政，長相善舞者，則可以當廠長館長校長。一切事業，變為官階。一問治國者，政治之權，付之官階，於人民無與。官階而賢且能，人民一時亦受其賜。然人亡政息，曾不旋踵；官階而愚且不肖，則人民受其禍。而官能自損。前者為嬰兒之仰乳，後者則為魚肉之於刀俎而已。國父曰：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故建國大綱第十五條有：「凡候選及任命官吏，無論中央與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院定資格者乃可」之規定。又國父上李鴻章書曰：「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則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佞進。秦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為士師，農學熟識者為農長，工學精者為監工，商情諳者為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輩，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即壯之所行。其學而優則能任，且恪守一途，有陞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淵深，習則智巧出。加之厚其俸，永其俸祿，則無不願之心，而能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不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由此觀之，國父明言我國建設，應用專家政治。他說：「其學而優則能任，且恪守一途。」則為專門性質無疑。既屬專門，則為技術無疑。古人對於學而優則任，均誤解其意。以為讀書，是為做官。有學問的人，什麼官都能做，從前可以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而現在是科學的世界，各有專門。這種封建思想，如不打破，則官守學業背道而馳，而行政官做政治。禍國殃民，莫此為甚。故本文以行政與技術為題，即述國父專家政治之意。

所有政治各部門工作，皆應兼顧，而行政既屬技術之一部份而已。有全國各科專家，以專門之技能，用其所習，實際參與政治，為社會國家，負起一部份責任，通力合作，以完成建國之偉業，而政府當局，選賢與能，聽取專家之意見，付與最大之自由，使政治事業化，官更專門化，行政技術化，社會科學化，才不負國父締造民國之苦心，建設新中國之希望！

此為我。故本文以行政與技術為題，即述國父專家政治之意。所有政治各部門工作，皆應兼顧，而行政既屬技術之一部份而已。有全國各科專家，以專門之技能，用其所習，實際參與政治，為社會國家，負起一部份責任，通力合作，以完成建國之偉業，而政府當局，選賢與能，聽取專家之意見，付與最大之自由，使政治事業化，官更專門化，行政技術化，社會科學化，才不負國父締造民國之苦心，建設新中國之希望！

# 現階段的中國政治

何汝津

## 一 現階段中國政治的任務

現階段的中國政治就是戰時的政治。戰時政治的任務，就是以政治的力量達到戰爭的目的；以戰爭的手段達到政治的理想。目前中國戰爭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軸心的侵略勢力，所以要運用政治的力量來配合戰爭的需要，也祇有政治能配合軍事，才能獲取戰爭的最後勝利，因此，第二期抗戰要旨，說「政治重於軍事」。中國政治的理想就是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社會，所以要運用戰爭的手段來掃除政治的障礙，也祇有掃除政治的障礙，才能實現政治的理想，因此，在全國精神總動員綱領裡面，有「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一個目標。總之，現階段的中國政治，戰爭與政治是分不開的，所以，一方面抗戰，一方面要建國；一方面建國，一方面要抗戰。

在這一個抗戰建國的過程中，中國政治的本質既如上述，因而今後中國政治的任務，主要是：

(甲) 以武力爭取民族獨立——民族獨立是實現政治理想的大前提。一個亡了國的民族，決不能，也必無法實現自己民族的政治理想。可是要民族能夠獨立，必須要有民族的武力；在國界一天未能泯滅之前，平時武力固感需要，在戰時更不在話下。因此，我國武力雖然落後，但決不妨礙其以武力來爭取民族的獨立。事實上證明，四年來的抗戰，憑藉了民族的精神，優異的地形，國際的援助，已打出了一條光明的出路。

(乙) 以經濟促進民生幸福——一個國家陷於戰爭的狀態，其結果必然減削國民的民生幸福。因為要把一部分國民的享受，

轉移到戰爭的消耗方面去，所以，戰爭的時間愈延長，而國民民生幸福也必然跟着愈減削。不過，這減削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它不能降低到生活的水準以下；否則，國民生存根本發生問題，而戰爭也就無法繼續進行。因此，節約儲蓄運動，在戰時是必需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必須實行增加生產和物資統制，或者實行定量分配制度，以安定全體國民生活；使民生幸福不致因戰爭而全部消滅，使戰爭力量得以不斷增強。

(丙) 以教育實現民權自由——我國民主政治所以不能實現，其原因自然很多，而教育不普及，民智過多，以致國家觀念薄弱，政治認識欠缺，却是主要原因之一。同時，要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就是實現「權」「能」分開的政治，要使政府有「能」，固然要靠教育的發達，而要使人民有「權」，也要靠教育的發達。祇有教育的發達，才能創造一大批政治的人才，才能使人民懂得政權的運用。目前的問題不是民權自由應否存在的問題，而是人民是否理解民權自由的問題；所以，建國大綱所規定的建國三程序，其中訓政時期，要積極發展國民教育，就是為此。

## 二 現階段中國政治的特徵

現階段中國政治的任務既是這樣，那麼，目前中國政治的動向是否執行了這一任務呢？從事實上來看，現階段中國政治已表現了如下的特徵：

(甲) 由割據政治到統一政治——不必諱言，抗戰前的中國政治，因為封建割據勢力的作梗，還不能完全脫離割據政治的形態。

直到今天，全國的區域除一小部分之外，大致已在中央政權支配之下。換言之，政治已趨于統一。最顯著的現象，就是政令的統一，軍事的統一，財政的統一，都已次第實行，而打破了過去各自為政，各自成軍，各自理財的割據現象。粗看將來抗戰勝利以後，由于國家民族的需要，割據政治的沒落，全民政治的實現，已成必然之勢。

(乙)由官僚政治到計劃政治——民國成立以來，中國政治的全面，太致不能脫離官僚政治的圈套。所以，儘管一方面革命政治不斷地高揚，一方面貪污風氣，假公濟私，任用私人，趨炎附勢和腐敗為奸的現象依然存在。無疑地，官僚政治之所以產生，是有着它的社會條件的，封建殘餘勢力和個人主義思想就是主要的因素。然而，由于抗戰的爆發，民衆的日益覺醒，這種官僚政治已遭受了驚人的抨擊，代之而興的，是計劃政治。我們祇要看新實業政策的施行，稅務的整理，金融、物資、外匯和貿易的統制，國營企業的發展，新縣制的推動，民意機關的逐漸設置，外交政策的確立，法制的頒布，銓敘制度的實施等等，便可知中國政治已向着計劃政治的程途邁進。

(丙)由一黨專政到立憲政治——在抗戰以前，中國國民黨為着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是以一黨專政的姿態出現的；在抗戰以後，中國國民黨雖然在政治上仍然居于領導的地位，可是，在某種程度上，已容許了其他各黨的存在，並且已從各方面準備實行立憲政治，俾得選政于民。事實上，國民黨是代表整個民族利益的革命政黨，爲着民族的生存，爲着打擊反革命的勢力，它不能不秉承着民族的要求，以專政的方式來擔負起革命的艱鉅工作。由這種滿清專制起，直至領導抗戰建國止，其間因爲受着民族落後的歷史條件所限制，雖然不能飛躍地完全達到革命的目的，而對國家民族的貢獻，播蕩了全國封建的殘餘勢力，領導全國對侵略者作殊死戰，由一個次殖民地進爲反侵略四強之一，這一種豐功偉績，是不能磨滅的。但是，如果反革命的勢力已經消滅，民衆的覺醒已使革命的勢力維持于不墜，國民黨自然可以退出專政的地位，而選政于民。

事實上，今日的國民黨已經趨向於這一個途徑邁進了。國民參政會和各種參議會的成立，憲法草案的頒布，民衆組織的實施，都是國民黨在實現立憲政治的工作。

由此看來，現階段的中國政治雖然還未能完成其應負的任務，黨實力、經濟、教育方面完全建立起民族生存的穩固基礎，可是，事實上已經邁進了一大步的建立起來了，無疑地，已有着很大的進步。

### 三 現階段中國政治的檢討

中國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環，它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世界政治的變化發生密切的關係。在抗戰以前，中國政治的發展是受着帝國主義者和封建勢力的阻撓；抗戰以後，這一種阻撓打破了，由于世界的進步的政權勢力的抬頭——反侵略的民主勢力的抬頭，中國政治鬥爭的對象單純化了。中國政治雖然獲得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在不斷地進取中，但是，無可諱言地，中國畢竟是落後的社會，畢竟受着歷史的限制，中國政治縱使可以有飛躍的進步，可以把世界範圍趕上，可是却不能在三五天之內就可以達到理想的大同社會，猶之乎我們不能決定三兩年就可以取得抗戰的勝利，而不得不從事于長期抗戰一樣。因此，一方面我們看見中國政治的進步；一方面我們却又看見中國政治有不少不滿人意的地方。但是，這不滿人意的地方，決不會遮掩了政治上的進步，也不能抹煞了國民黨在政治上偉大的勞績。照這幾年來在政治設施上所表現的來看，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甲)民治基礎的確立——第一是民二十七年七月六日成立的國民參政會。這一個會雖然不是完全根據民選的方式產生，也祇已盡一盡網羅全國人材之意旨，且藉此而建立民意機關之初型。據稱，總合該會歷次大會決議案，有三要端：一爲擁護國策；二爲協助政府決定憲政基礎；三爲協助政府建設西南。而該會歷屆議決案達千餘件，政府都能大致執行，其不能執行的，政府亦必詳

陳其原因。可見該會已能發揮民意的機關的最大作用。其次，在樹立基層民意機關方面，中央會於去年八月九日頒佈縣參議會組織暫行條例，縣參議員選舉條例，鄉鎮組織暫行條例及鄉鎮民代表選舉條例法規四種。自從這些法規頒佈後，據報各地已成立縣參議會機構的約達十分之三四。也可見，中國政治上民治基礎已逐漸確立。

(乙)行政效率的增進——中國政治的進步，還未能達到理想的境地，一部分原因也由於行政效率未能增加。可是，這幾年來，中央方面已對此大加注意並切實改進。例如第一、中央機關的調整——設立國防最高會議，裁併各聯枝機關，樹立行政三聯制，設立專管機關。第二、吏治官常的整飾——嚴懲貪官污吏，實施廉潔考試等。第三、改革基層機構——實行新縣制。所有這些事實，不能不說中國今日的政治已逐漸走上了軌道。

(丙)經濟建設的推進——關於經濟建設方面，雖然關係國防秘密，但照目前軍事所剩餘的來看，也有不少成就。關於工業方面，抗戰初起，中央計劃內遷工廠共有四百四十個單位，截至三十年六月底止，已復工的有三百二十二家，其在後方新設的，於同年六月底止也有五百四十一個單位。這裡包含有電力工業，燃料工業，冶金工業，機器工業，化學工業等。在目前物價上漲，原料不足，工人缺乏，轟炸頻仍，還能有此成就，不得不說幾難能可貴。關於交通方面，雲南、黔桂、湘桂、滇桂、中印五大鐵路，都已開闢，並已有一部分通車。新築公路，有樂西、西蔭公路。而滇緬、川康區、西北區、西南區公路也在不斷改善中。此外國際航線之開闢，水運之整理，聯運之發展，都是一些艱鉅的工作。對於糧食管制方面，自糧食部成立以後，已積極籌備軍糧供給與民食調劑，也盡了相當的努力。最後關於國防建設方面，最可注意的是近幾年來各兵工廠已相繼拆卸，由京、滬、魯、豫、粵、川，都已早有出品，各項輕型武器，已達自足自給地步。

由此看來，現階段的中國政治，雖然還有不少需要努力的地方，而大體看來是值得樂觀的。

#### 四 現階段中國政治動向

歷史是向前的，社會是進化的，所以，一切現狀都不會予人以滿足；政治也是一樣。因而一個不滿現狀的人，不一定是一個叛徒，也許是一個創造者。但是由於人類的不滿現狀，再加以中國特殊的複雜的歷史背景，却產生了今日中國人對中國政治各種不同的看法。這些發生以後，雖然大家都趨向於一多，共赴國難，可是，不必諱言，對於今後中國政治的動向，仍然有着一小部分不同的見解；祇要看今日各黨派的政治活動仍然存在，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的確，中國民族是在一個劇烈的變動中，這是一種劇變，也就是在政治上的一個大試驗，這一個試驗也許把各種紛歧複雜的政治活動湮合為一；但是，政治的試驗雖然由此也可以順利進行，有時却也難妨不會不演出一個大悲劇。因此，為着減少民族的磨難，培養民族的元氣，一面我們固然要認清今日中國政治的主流，而一面也須認清了今日中國政治的支流。如果我們把主流認作了支流，或者把支流認作了主流，這不僅在政治上走錯了方向，而且會做成民族的危機。

無可否認地，今日中國政治的主流是三民主義的政治，而此外的政治體系都不過是政治的支流；這些支流祇有加入了主流而盡其推進的作用，否則，它祇有被主流的淘汰，而完全湮沒了它的作用。不作如是觀的人，是不能了解政治的動向，也不能了解現階段中國政治的動向的。那麼，什麼是現階段中國政治的支流呢？我們可以把它們分為下列幾種：

第一是空想的民主政治運動——他們以為祇要把東西南北各式各樣的人集合一堂，把紛歧複雜的政治思想合在一處，中國便可以走上民主政治，而中國便得救了，因此，他們想一些人對時局時常

# 黨的 文 藝 政 策

· 劉 鎮 濤 ·

## 一 黨需要文藝政策

首先要說明的是：這裡所稱的黨就是指中國國民黨。這裏所稱的文藝是指狹義的文藝，即是文學。中國國民黨為甚麼需要文藝政策呢？以下就是幾點簡單的理由。

第一、我們知道，黨的主義就是三民主義，主義是甚麼呢，人人都知道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三民主義不單是一種思想而已，并且也要實行，但實行必靠力量，力量從何而來呢？這就有

待於黨衆的信仰，沒有黨衆的信仰，任你三民主義如何正確，如何完美，還不過是幾個人的思想而已，始終無法實現。所以要實行三民主義，就必先使它變成人人人的信仰，由此而產生偉大的力量。這就有賴於宣傳了。國父常要我們注意宣傳，喚起民衆，其作用即在於此。目前，黨已經有了正確的三民主義，可見思想已經不成問題，成問題的，只是如何去宣傳，使其變成信仰與力量。我們不要以為三民主義已經實行了許多年，宣傳的重要性便已經減少，其實目前最重要的到底仍是宣傳。

那麼我們的黨應該怎樣去加強三民主義的宣傳呢？宣傳的方法甚多，但却以文藝的宣傳作用最強。學家克勞說過，「文藝就是宣傳。」其實何只如此，我們簡直可以把這句話改過來說：「宣傳就是文藝」才對呢！

文藝的宣傳性之所以比任何宣傳方法為強，這個道理大概是因為：①文藝是具體的形象之表現。②文藝是訴諸讀者情感的一種藝術。因為文藝以其具體的形象提供於讀者的眼前，所以讀者容易相信，俗語說，「百聞不如一見」。可見一般人的心理，在相信之前，必先要求親見。文藝所提供的具體形象當然不就是客觀實現的本身。但比較起空洞的道理來，已經是接近於客觀的現實了。其次因為文藝直接訴諸讀者的情感，人是感情的動物，一經感動，自然信仰不疑。

總之基於文藝具有以上的兩個條件，所以文藝向來是被人用來當作最好的宣傳工具。比方中國共產黨，他們就比我們中國國民黨高明得多，他們以黨來執行其文藝政策，在組織上

議論風生，把戰時一切的統制政策，都認為獨裁，認為壓抑。他們從不考慮事實的需要，而追逐着政治上的空中樓閣。

第二是暴力的法西斯政治運動——這一種運動在目前不會發生若何影響，不過有幾種企圖的活動是存在着的。他們認為中國是一盤散沙，非用暴力來強度的集中，不能抗戰，不能生存；而對於軸心的侵襲成就，輒心神往。他們大都充滿着英雄主義的領袖慾。

第三是陰謀的共產主義政治運動——他們聚集着一些流氓、土匪、逃兵、農民，無出路的小市民，野心的份子，在窮鄉僻壤來從事無產階級專政的運動。他們的口號的漂亮，確可以叫一般窮小子興奮。他們的理論鑲天架响；有時連有錢的小姐少爺們都心然嚮往。但是，他們並沒有無產階級的隊伍，實際上他們也無從找到這一些隊伍。他們在過去已經經過不少血的教訓了。

這三條政治上的支流，會發生什麼作用呢？能發生什麼作用呢？歷史必定能夠而且已經予以事實上的証明了。我們希望徘徊于政治歧路上的人們，對此能加以若下的認識。



他們有過左翼作家聯盟；在理論上他們有所謂唯物史觀的文藝論。他們把魯迅提出來當作一個標準，又成立魯迅學院，把魯迅變成他們的文藝圖騰。魯迅的功罪，我們不必深究，他對於中國文藝界的貢獻自然有其不可磨滅的某部份功勞，不過是否真如共產主義文藝家們所吹捧得那麼偉大，即成問題。他們之所以要如此做的原因，不外是對於黨的文藝政策之執行而已。坦白說一句，就是別有政治作用。

自然，共黨要宣傳他的主義，所以就盡量利用文藝，這種方法却是從蘇聯那方面學來的。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黨要宣傳其黨的社會主義，對於文藝非常重視，在蘇聯的人民委員會下面，黨利用政府的力量推行文藝政策。蘇聯的文藝作家協會，就是由政府的力量去支持的。當布爾什維克黨初握政權，他們曾經有過「河路人」的政策，以自己黨內的階級文藝份子為核心，爭取同情於社會主義的文藝作家為外圍份子。在幾次五年計劃實行的時候，文藝政策的推行更加積極，無論在集體農場裡面，無論在工廠裡面，無論在各異民族當中，或甚至國外的遊學，文藝工作都在熱烈地要求一般青年去從事，高爾基並曾特別為此寫過一本討論文藝工作的書去鼓勵他們。

從上面的約瑟舉例，可以看見一個政黨應該如何去運用文藝政策的。對於魯迅，共產黨這樣運用文藝政策，我們不但是不反對，而且非常同意。因為它正是蘇聯當今

唯一的政黨，而其主義又正適合蘇聯的國情，那麼要推行其主義，自然非採用文藝政策，加強主義的宣傳不可。至於我們國內的共產黨也採用文藝政策，那麼我們不單是不能夠同意其繼續下去并且覺得中國國民黨有加強以蘇攻蔣，從速確定文藝政策來實行。

也許有人以為中國國民黨是堂堂正正的黨，一切宣傳及行動，均應堂堂正正出之，不應有什麼政策之類的手段。其實政策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政策的目的是否正當而已。我們當然知道「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所必需」，並且為世界今後所必需；不過實行三民主義却要全民去實行不能有所例外，如果全中國的人民有一部份受了共產主義文藝的影響，對於三民主義的實行不努力，或甚至不去實行，而竟敢拿出階級鬥爭的行動來破壞，那麼我們怎樣辦。目前已經有或多或少這類的事實了。現在大家恐怕都有感覺到紛歧、雜亂的思想要亟待糾正吧。比方說共黨的思想，倘若我們站在民族的立場一看，它的思想無疑是非常紛歧雜亂的。舉個例來說，它的外交理論說不是中國獨立自主的，在解放週刊及黨報週刊中我們就看見幾個有趣的轉變。在蘇聯外交論時期，因為蘇聯及法西斯有「不良的關係，於是蘇聯特種的頭上，加上「強盜」「強盜」兩項帽子，轉到德蘇訂立不侵犯條約之後，於是立刻變稱希特勒為「元首」，而「強盜」「強盜」兩項帽子，又轉送給張伯倫邱吉爾；現在德蘇關係之後，「強盜」「強盜」兩項帽子，又從

邱吉爾頭上奪回來，給希「元首」戴上了。這有連事實之被提出來說，無非想說明紛歧雜亂的思想的確存在的。黨既要實行三民主義，那麼它首先得令到全國的人民能夠把意志集中起來才有辦法，換句話說，它一定要加強黨的文藝政策，一方面去阻止與本黨主義相違背的文藝運動之發展，一方面健全起本黨自己的文藝運動之推進。如此才能盡宣傳說服之能事，產生信仰和力量。這是現實的需要，黨的任務，絲毫不能忽視。

第三、我們要知道，上面理由是在黨的立場上提出的，可以說是一種政治上的理由。除此以外，我們認為黨需要文藝政策還有其學術上的理由。

三民主義之完美在今日已不獨是黨內的人以為如此，就是在一般學術界裡面也逐漸引起了熱烈的研究，只要不是別有會心的學術研究者，無不一致公認三民主義具有豐富的創造性，綜合性，時代性，社會性，革命性，科學性，哲學性，與世界性。

三民主義既然如此正確完美，那麼，以此為基礎的文藝運動，難道不應該努力提出麼？文藝是客觀現實的反映，雖無目的意識性的推動，也能够跟着客觀現實的發展而發展。不過有了目的意識性的推動，則其發展更能夠有規律，不走冤枉的彎曲道路，達到成長也必然迅速得多。

三民主義文藝過去未能好好發展，這不能說是三民主義的客觀現實并不存在，也不是說三民主義沒有好好的發展，所以作

為社會意識形態之一的文藝也因之無從發展。真正的原因還是在於⊙真正的三民主義文藝界的主觀努力不够，追不上現實。⊙沒有一個文藝理論與創作的中心以為文藝界的標的，⊙文藝理論與創作現實的創造把沒有定見的文藝理論家與作家的眼目弄亂了，使他們變成人家的外圍份子而不自覺。

這顯然是文藝的厄運！空曲的理論和捏造的創作終有一天給歷史粉飾，到那時，會給走過紅運的政權化的理論和口號化的創作，是必然會大批大批地被束諸高閣，如同張着平頂的帽子一樣不引起人們的理睬。不過，目前它給與真實文藝運動的影響是不能無視的。它正如炸雷一樣，震動於文藝界心腹之間，震動了機體的生長。

因此，我們把關於文藝的宣傳性不說，就只從文藝自身存在的理來評說，也覺得中國國民黨有建立起黨的文藝政策之必要。科學界人之智，藝術動人之情，總合起來才算得是完善的教育。黨具有建立教育文化的責任，對此當然不會不為之關心的吧。

### 二 黨的文藝政策

作者以為目前黨應採的文藝政策最少有如下五個：一是健全作家聯系的機構；二是建立三民主義的文藝理論體系；三是延攬優秀作家；四是提拔青年作家；五是推廣文藝出版事業。

第一，先說健全作家聯系的機構。我們

都知道現在是科學的時代，科學音重組織，組織是現代社會一切實踐的最高原則，有組織，則意志集中，步履齊一，力量龐大。所以我們要黨的文藝能有順利而有效的開展，首要的是組織。然而組織也是要有條件的，假定我們是以黨為實施文藝政策的工具，那麼這些組織就必須受黨指揮，服從黨的決議，執行黨的政策。

過去中國文藝界的小組織可謂多矣，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可以說得是代表者。抗戰以後，由於全國精神團結的號召，文藝界才開始有全國性的組織，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及各地的分會紛紛成立。同時中國文藝界亦在空前進步的途程上。老舍先生在其「談抗戰文藝」一文裡面曾有過詳盡的說明，他說：「自抗戰以來，值得稱讚的是文藝已找着他的正路，消極的（一）他不再遺棄生事，以個人自己為能事；（二）它不再由私情所好，以風弄月，或香豔肉感，以博得名；（三）它不再退縮西文派，自甘得這而自陷於附，積極的，（一）它把抗戰建國的偉業放在自己肩頭上，即使才微力薄，亦能盡責任，而居心則善，實有愛國愛民的熱誠；（二）牠因愛國家愛民族而把小小的私怨置在一旁，寧可與英雄不交英雄，也不肯真能把老子罵倒而罵老子，文藝工作者都起手作起朋友來，大家只有一個敵人——日寇；（三）它對自己有信心，儘可以不去羨慕別人，而還能立腳得住；它有自家的光榮戰績，而且可以用自家的語言風格形式寫作出

來，牠的民族正在爭取自由獨立，它自己也在爭取自由獨立。」的確，全國文藝界有了全國性的總組織以後，牠們的文藝同時也有空前的進步。不過這中間是否尚有一切直接的因果關係呢？這倒却是另一問題。就假定這一切的成就都是文藝界現有的組織或成就吧，我們也總覺得有組織與否的需要，為甚麼呢？因為現有的組織雖然有極多的缺點，比方我們試問，這些組織是否有利利用過其本身的機能和力量，有系統地推行三民主義文藝理論的成立，或有計劃地補助作家和教育作家呢？關於這點，老舍先生在共商一文裡，亦有極平言之：「直至抗戰第五年，政府才有文藝補助金的籌畫與實施。可是補助金的額數并不大，而且在戰時交通不便，消息不靈，文藝工作者又散處四方，山河遠阻，於是補助金的發給既嫌於水車薪，又未能普遍，至於文人自己，雖有甚高稿費運動但成續又作，文藝協會雖然將來再舉，可是無法使之必能生效，因為牠畢竟是一民衆團體，沒有發給命令的權力；」這真是一語道破，文藝界現有的組織就是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民衆團體，它未能直接成爲黨的一環。

除了民衆團體的文藝協會之外，中央黨部宣傳部在二十九年年底雖有文化運動委員會之成立，同時在三十年初軍委會政治部也有文化工作委員會之成立；不過這些機構總是帶有一般文化性，而非能單獨以文藝為專門對象的。所以我們對於牠們的期望也

不能太大。

總括一句話說完，今後黨要積極進行文藝政策的話，那麼一定的原則必需要以黨為領導主體，把現存一切文藝之類的組織，由民衆團體的性質，變成黨的文體，受黨的指揮，服從黨的決議，實行黨的政策。

第二、建設三民主義的文藝理論體系。有了推行的組織以後，就要有工作。建設三民主義文藝理論的工作大概可以分兩方面來進行。

首先是「破」的方面，要能够有系統地，具體地把現行一切不正確的文藝理論與作品，施以無情的批評，露出他們的嘴臉，作為一種總的清算。這工程是相當艱鉅的，原因是，過去一向就很少有這類的工作基礎，現在來着手，真是千頭萬緒。然而這工作是頂重要。假使我們不能一清二白地指出某種理論（甚至需要指出其本書上的理論）和某種創作如何如何的不正確，任其沈浮自在；那麼，觀聽不正，愛好文藝青年，選擇不慎，固陋不化，很容易上當。這件工作必先有計劃，最好能够由黨領導的文藝機構下面分組負責，將目前一般最不正確而又最流行的文藝理論書及創作作品，先來一番調查工夫，然後分頭集中火力來批判，火力不但要集中，非至擊倒這些理論和作品不止。

其次是在「立」的方面，我們所以要破，完全為的是立。所以一方面我們要擊倒歪曲的文藝理論，同時自己却要建立起三民主義的新現實主義的文藝創作理論。不過我們不要忘記「太陽之下沒有新的東西」這句話，新

的理論原是從舊的理論中揚得來的。就以三民主義本身來說，雖是它具有豐富的創作性，但並不應為一種「集合古今中外學說而成」的結晶品。新的三民主義的文藝理論也不能例外地完全與世界文藝理論之成果無緣。反之，它倒要從他們那裡吸收其精華來使自已長大。因此，在過去的或外國的理論家或作家當中，其人的政治主張或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但也許在藝術技術上它有為我們採納的地方，我們也不妨（而且應該盡量）採納。文藝內涵和藝術技術雖非可以絕對分離，但也非絕對不可分離。假如我們祇就其內容論，認為它與三民主義，就其具有價值的藝術也一併採納，這豈不是看見資本主義可憎，而連資本主義的高度生產技術也狂愛，一是不通。

因此，我們需要批判地介紹世界的理論和名著和國內各作家的作品，但是，即要以建立三民主義的文藝理論體系為中心工作。

第三、延攬優秀的作家。我們都知道蘇聯曾經有過「哥路人的政策。我們黨也不妨採用此類類的政策。我們知道有很多作家本來並不是有真正加入什麼別的黨派的，祇因文藝作家多數愛好光明，曾患黑暗，於是其在作品中不免盡發露之能事，把社會的黑暗揭露。有時感憤激，免不了過火一點。不明白底蘊的人看起來，似乎是有要派別作用，其實這只是文人苦悶的表露而已。這一類的作家，黨應該盡量延攬。他們本來是不反對三民主義的，黨應當善用其同情，使其發揮。三民主義文藝的方針，擴大文藝的影響，不宜「三民主義文藝」又使他們被自外於三民主義文藝作家之林。上梁山，不是好辦法，這是黨應該決定的態度。

然而黨不僅要有態度而已，並且應有實際的行動，前個月國家總動員文化宣傳週文藝日，重慶文藝界抗敵協會召集過一次文藝作家座談會。討論的題目是：「如何加強文藝界總動員」。討論中心有一項關於政府應注意解決作家生活的，王平陵先生提出「並望政府給予作家平價米」。任鈞先生且主張作家至少也應該領公務員時貨金。這一切黨都要注意到，為如果需要認真執行文藝政策的話，那麼就不管如何的困難，也應當用黨本身的能力或間接用政府的財力去完成這類的工作。我們已經說過，蘇聯的作家就有幸福享受其黨與政府所給予的種種優厚待遇。中國國民黨如不欲健全國家的聯系機構則已，否則這項工作，尤不可忽視。

第四、提拔青年作家。抗戰以來，不少青年跑到前方去工作，青年人十九愛好文藝，他們在前方搜集了不少戰爭的材料，可是他們缺乏理論的修養，缺乏寫作的經驗，即沒有人去指導他們，教育他們。有一些縱使能寫出一些作品，然而姑且三民主義文藝立場的文藝刊物似乎又不多，無法收容這些作品，這一般青年的文藝工作者只有苦悶。於是不得已甚至主觀地被迫去作曲作詞的主題，把稿子送到與三民主義文藝相反的文藝刊物去迎合編者的意圖和口味。這是危險萬分的。

其次青年文藝作家之在後方的，搜集了不少戰爭材料，本當如軍隊後方，按時撤下來整理材料以寫為作。在後方法應當按時撤下，去替換他們的久在前線的弟兄。可是這絕不是民衆團體性質的文藝界抗敵協會所能辦到的。結果是青年文藝工作者們只好過

# 小黃馬的哀歌

盧 森

南方的冬天景色  
還是擁有財產而富裕的  
無賴的北風那麼貪婪  
總要把外殼粗神  
衣服不入時的鄉村  
要敲榨，搜括到赤貧才甘心

——是前年有寒霜之晨  
山那邊傳來多響的砲聲  
在耳邊迴盪地愈來愈近  
小黃馬看見營前的行列敲整  
嘴角的冷汽映着朝陽。  
像旗幟上的旋風一樣飄拂  
牠看見每天料理牠們  
人都叫他再興的  
用糶粒加上母親的身說：  
「樹生，牠本不宜上陣  
生命的承擔者  
還要統帶的乳尖……」  
「這算是你的慈愛吧  
我們奉長官的命令  
指定要準備的馬額  
你沒有夠數哩」  
「你這（對小黃馬眼）眼」  
牠出來看世面  
最先便叫口別種的響聲

牠呢（在巖上拍一拍）  
才第一次做母親  
就要生下兒子去遠征

那天牠的母親沒什麼憂愁  
只示意牠多喝一陣乳  
免在中途乳房漲痛  
牠也以爲練習習戰  
披一背屋子就會回來

再興不許牠追隨  
用粗粒把小黃馬和緊  
在疏稀寒望大隊滾滾向前  
牠的母親嘶鳴的響聲  
很遠地過來還可以辨認

聲音裏好像沒有牽掛  
牠更寧犧牲精神  
兩句鐘禁閉後小黃馬恢復自由  
勁務兵驅牠到廣袤原野  
牠不喘那乾草因爲  
沒有什麼能蓋住乳香的美味

晚來牠睡不著覺  
只等待母親腳步的響聲  
肚子裡嗚叫起來

着他們自己的日子，有材料的寫不出，要寫的沒有材料，談不到寫作計劃，作品也就深乏豐裕，我們祇聽到精神食糧荒歉的響聲，而看不到人事調整的辦法。

這些種種都是妨礙青年作家進步的條件。我們深覺得：只有黨才能集中全國的優秀作家，集中全力去負責指導和教育這班青年；只有黨才能設法盡量收容青年作家的作品；只有黨才有權力担負起人事調整的責任。

青年無疑是一民主義文藝的生力軍，他們現在開始學習，假定我們不於此時予以教育與協助，任三民主義文藝與着自然生長的歧路發展，這是黨的最大失策。年來文藝獎助金之類已經漸見增加，比方最近廣東方面，省黨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都同時舉行文藝競賽，這些無疑都是提拔青年作家的措施。不過這種運動似乎更要推廣，不但把它當作一種臨時性運動而要使之成爲經常性的運動。

第五、推廣文藝出版事業。黨有了健全的作家機構，中心的理論體系，優秀的作家羣，廣大的青年作家預備軍，就應該用盡全力去推廣文藝的出版事業，使文藝的書籍如同春天的細雨無孔不入地分佈到每個角落都有。量的增加必然產生質的提高，這時節，不僅是三民主義的宣傳賴以深入普遍，而就文藝本身說，也將有偉大的作品出現的。

黨需要文藝政策，黨需要的就是這些文藝政策。



「這是不講情面，怕你來的。」  
 「這是我怕你來的。」  
 「這是我怕你來的。」  
 「這是我怕你來的。」

小黃馬想把委副職出來

「說他是可耻的逃兵」

「倒給別人作明證」

「喬裝的里馬的豪雄呢」

「喬裝的里馬的豪雄呢」

「喬裝的里馬的豪雄呢」

「隊長對女員說：『在今天不生不成汽車，唔……唔……這匹小馬是便宜的』」

「哈，或許去會見他」

「不如對那小黃馬」

「一頭他對女隊員一面乞餅」

「一頭他對女隊員一面說些話……」

到溫得沒有冬天的天後方

「放牠在廣場上去散野」

「見隊伍演習操練」

牠對夕陽吐一口心病的鬱氣

小黃馬溫見大隊的馬群  
 在那兒可聽不見母親的聲音  
 雖然，那兒有許多母親  
 可都不是那低過心底下的呀

「小黃馬，你主人帶過醫生來買好藥，你主人說……」

牠的腳子，由遠處去

「越過越好，本是小黃馬的希望」

「那知這好本是小黃馬的希望」

「一切都用欺騙來痛苦著牠」

「這從主人身上，風能依他的心去挑選主人」

「一滴汗，一滴功勳」

「有時在黑夜裏背主人」

「送給好清的人」

「牠却眼石主比與他（牠出來，風寒，冷，牠要牠）」

「一天，二天……分開給牠的」

「都是難以做到的苦與與」

「沉溺於苦海會發出呼聲」

「不能交我新受得早日離開呀」

「沒有牠大家的事業，林康呀」

「用淚回答主人，你願這」

「當背運一批遠禁品回來」

有小黃馬的巨神增加了重量  
 小黃馬的神魂  
 牠已是主人生產的股本  
 從此牠對地接防的

「同伴們下頭，苦痛的又在牠心裏踐踏著……」

「我求學時，打國賊」

「有偵查員，示破國賊」

「定比偵查員，示破國賊」

「到這天，那黑心小黃馬，終不來……」

「又是一天的深夜」

「在獨宿的深夜」

「意兵大嘍一聲，抓住」

「喘氣未停的小黃馬」

「背上終給拉下地上來了」

「但是，終給拉下地上來了」

「刺刀，認真地」

「小黃馬，利來是黑泥的馬背整」

「兵用利來是黑泥的馬背整」

「平日威風，真難的片……」

「絕望地，不想說一句話」

「『人正法，貨充公！』」

「『這是命令，由一……』」

「『我們是敢不動！』」

「『一個兵拉了小黃馬』」

「『另一個抓着小黃馬』」

「小黃馬受這呼聲」

「也無法像人們舉前是」

「把長槍孔掩住，只看到主人」

「被押到比馬廄還壞的監裏去了……」

「(完)」



# 廣東省銀行

本行係在民國十三年為 總理所手創，現有資本額國幣一千萬元，各項公積金及預備金一千五百九十餘萬元。經向財政部註冊，設有業務、信託、儲蓄、農村貸款、節約國儲金等部，全省各縣市國內外均設有分行並有代理銀行，辦理存款、匯兌、信託等業務。並代理省庫收支，手續快捷，取價低廉，如蒙賜顧，無任歡迎，各界諸君，尙希留意！

總行：廣州

分行：香港 星架坡 韶州

支行：連縣 興寧 梅縣 台山 梅菪 北海 廣州灣

辦事處：重慶 昆明 貴陽 桂林 梧州 柳州 衡陽

龍州 龍南(江西) 金華(浙江) 長汀(福建) 九龍 實兆(曲江)

馬場(曲江) 連山 陽山 樂昌 坪石(樂昌) 南雄 仁化

英德 清遠 始興 翁源 乳源 龍門 三水 惠陽

淡水(惠陽) 河源 大埔 高陂(大埔) 大埔(大埔) 湖寮(大埔)

老隆 揭陽 河婆(揭陽) 松口(梅縣) 丙村(梅縣) 會坑(梅縣)

白宮(梅縣) 普寧 饒湖(揭陽) 饒平 黃岡(饒平) 和平 陸豐

海豐 平遠 豐順 饒德(豐順) 蕉嶺 新鋪(蕉嶺) 五華

連平 紫金 惠來 開平 赤坎(開平) 廣海(台山) 信宜

東鎮(信宜) 化縣 遂溪 徐聞 廉江 赤溪 肇慶 德慶

廣寧 雲浮 新興 羅定 鬱南 鶴山 封川 開建 四會

江陽 茂名 瓊崖 陽春 海康 靈山 東興 恩平 吳川

電白 欽縣 斗山(台山) 新昌(台山)

海晏(台山) 端芬(台山) 南口(梅縣) 松源(梅縣) 白侯(大埔)

安流(五華) 流沙(普寧) 聖塘(恩平) 單水口(開平)

專設金庫：新豐 佛崗 高明 東莞 博羅 南山 從化 澄海 潮安

新會 寶安 龍川 中山 連平 雲南 開平 潮陽 遂溪

總行：廣州

省外代理行：散佈上海 天津 青島 北平 漢口 屯溪等城市

國外代理行：散佈倫敦 紐約 三藩市 仰光等城市

## 世界兵學月刊

李浴日主編

第四五期合刊本

### 要目

得兵心的要訣	馮玉祥
現代戰爭	萬履焯
與新兵	郭耿生
兵破管	郭耿生
我們戰敗	美國漢遜白爾溫著 會明山譯
希特勒的計劃	會明山
德國軍事原理	儒真譯
英德兩軍	美國謝米特著 靈均譯
步兵之兵器	靈均
俯衝轟炸機	日本山本峯雄作 林哲譯
的新戰術	蔡臨水輯譯
海軍的偽裝	吳逸志中將著
為將與治兵	陳南平
兵力經濟	陳南平
使用之要領	陳南平
太平洋戰爭之研究	吳光傑
零售國幣一元二角	
定閱全年國幣十四元	
掛號寄發每冊另加國幣三角	
歡迎代售訂有優待辦法函索即寄	

### 訂閱處

韶關上后街三十六號後座二樓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廣東省圖書雜誌審查處發給審查證字第三九零號

售每冊一元